

薄熙来传

姜维平

最初的印象

我 1982 年从辽宁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官方分配到大连日报文艺部做编辑，而大连辖区金县（后改为金州）则是我经常去访问的地方，那时做为一个党报副刊的记者与编辑，很容易被业余作者与众多的投稿者称为老师，因为假如某个工厂的工人能在报上发稿，出了点名，就有可能由工人转成干部，何况还有稿酬，所以副刊版面成为很多业余作者羡慕的名利场。我印象的金县业余作家不多，有孙惠芬等人，但他们创作很刻苦，投稿很积极，所以也热烈欢迎我去金县，当然文艺部的主任张德言也希望我去那里，一是组稿，给一些业余作者开会，讲课，再把修改后的作品带回来发表，二是访问那些地方官员，撰写人物专访，发在报纸的农村版上。大约在 1984 年底，即[薄熙来](#)从北京空降大连后不久，我在金县政府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了薄熙来，那天我先与县委书记陈美良谈过话，但不过 20 分钟，记忆中是一位姓袁的办公室主任说，薄听说大连日报来了记者，他学过新闻，也愿意与我相识，想马上过来，我对高干子弟向来厌恶，此前有人在报社风传，薄一波的儿子与张庭发的儿子，均同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下派到金县镀金，我对这些人有点好奇，但并不看好。做为一个贫苦家庭出身的记者，我对他们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正在踌躇迟疑间，薄熙来已大步穿过走廊，踏进陈的办公间，第一印象是身材颀长，笑容可掬，他有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但眸子中深藏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冷光，他笑得很甜，不断地说都是同行。原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任副主任之前，曾在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做研究生，导师是人民日报副总编翟向东，薄说他的理想一直是当一位记者，很愿意与我认识交流，但不知为什么，与陈美良一样，我一点都不喜欢他。后来金县包括陈美良在内的地方官员普遍认为，他是奉老子之命，来基层镀会的，他给大家的总的印象很不好，农民喜欢真诚，他太虚伪，农民喜欢实实在在地做人办事，他则热衷于表面文章，巧言善变，心胸狭小，总之，他与农民想的问题距离甚远。但陈美良说，设关系，别理他，最多不过三年，他就会回北京。[王立军](#)

为什么他要来大连

看来金县人原本就没有看透他，之所以他从北京到大连挂职锻炼，薄一波是深谋远虑的。做为中共的元老，薄一波不仅有过自己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黄金时代，也体味了被政敌差一点整死的屈辱生涯，所以，他谁也不相信，只相信权力，而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他的儿子身居党内高位，是更重要的事情，象中共官员大都认同的那样，革命应有红色接班人。他认为儿子薄熙来是天生当官的料，比两个兄长要合适，在确定了另两个儿子奔钱而去的同时，他亲自策划了薄熙来奔权而去的前程与方案，道理不讲自明。当薄一波被政敌踩在脚下，关在大牢里的时候，薄的第二任太太胡明自杀身亡，薄熙来流落北京街头，饥寒交迫，忍受欺辱，不得不堕落成了小流氓与小偷，后因盗窃罪被判刑 7 年。如果不是

华国锋等人粉碎四人帮，不是胡耀帮果断地平反了薄一波为首的 61 人叛徒案，他最多出狱后 能当一辈子工人，解决温饱亦是人生理想。而恢复高考后，薄熙来不仅走后门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深造，又在次年变换学科，成了中科院的新闻研究生，而且毕 业后踏进中共中央办公厅，当上了国家副处级干部，又丢掉了当文人的浅薄梦想，立志下基层锻炼，欲成为中国政坛的新星。

薄熙来自京下放，概括原因有两个，一是政治原因，80 年代初，电视剧《新星》中主人翁李向南对他的巨大影响，他肩负父辈的使命，从县长做起，一步一步爬上了北京中南海的权力金字塔。二是家庭原因，即然薄家的一切物质与精神生活均以权力决定与选择，因此东山再起后，薄熙来无情地抛弃了结发之妻李某并不奇怪，此前李雪峰是他的岳父，当他追随林彪受到牵连倒台后，薄认为谷开来的父亲，在部队身居高位的谷景生，更合适并有助于他的仕途。所以在北京大学读书 时，就与谷开来明来暗往，这一细节已经原香港文汇报驻广州办事处副主任林某证实，显然当时问题相当麻烦，他与前妻有了儿子，所以李某对其抛妻离子不依不 挠，于是跑到大连去避风，可能更明智一些。

于是，原大连市长崔荣汉便浮现在薄一波的脑际，他们是山西人老乡，俗话讲，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薄一波亲自打电话给崔荣汉，崔一口答应接受薄熙来，依当时级别，给个县委副书记干干，用薄一波的话讲，儿子交给你，你看着办！崔荣汉一个令，薄熙来成了大连金县的李向南。

起步很不容易

刚开始，由于金县机关干部对薄熙来的政治前程并不看好，追随他的人并不多，而阻挡他仕途的人却不少，我印象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三个人，一个是陈美良，一个是唐启舜，还有班耀曰，陈与班是平级，前者是金县书记，班是甘井子区委书记，他们都紧跟主管区县工作的副市长唐启舜，对薄加以排斥，搞得他很狼狈，一度还想打退鼓，退回北京。我对唐比较了解，不仅工作上与其多有接触，而且与其弟弟唐启政亦熟，启政在大连印柴厂工会担任主席，主抓足球队，而恰恰厂队又十 分活跃，我负责体育报道，又是球迷，故与启政很谈得来。据说，唐副市长对薄熙来有意见，是因为他认为他两面三刀，讲漂亮话，办埋汰事，讲哥们义气，不讲党 性原则，一身公子哥派头，又沾上狱油子恶习。而唐的性格是诚实守信，会团结人，工作肯吃苦，从不拉帮结伙。唐还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评价薄说，这是个本 质很坏的人，世界观是在大牢里形成的，又饱尝世间的人情冷暖，对人冷酷而现实，又狂热地追逐权力，所以设救了。唐预测说，如果有一天当了大官，薄熙来会把 一大批好人投入监狱，因为他需要权力复仇，需要监狱整死反对派。然而，当时包括我在内许多人，均认为唐未免有点言过其实，薄的确太张场，长得洒脱，又有文 凭，又有靠山，想在金县干一番事业，所以唐大概是出于嫉妒。

不过由于唐的位置与影响力，金县以至大连开发区管委会的干部，都杯葛薄熙来，只有少数几个哥们认他，比如孙广田，孙世菊，刘宪茹，王传志，白玉祥，李德和等，这些人后来都被重用。唐大权在握时，这些人除了是农民，就是村妇，再不就是郁郁不得志的小官员，对唐怀有忐忑不安的恐惧，对薄充满迷迷离离的

希望。我记得 1984 年大连开发区创办伊始，崔荣汉有意叫薄当头儿，他知道继深圳特区之后全国第一个开发区的份量有多重，但薄熙来被任命为副书记，却只上了十天班，不得不光挂个名，空摆办公桌，退守金县七品芝麻官。

唐对机关干部说，谁也别理他，叫他从大连滚！于是薄的办公桌连清洁工也不去擦，机关干部大都不与他搭腔，他进了办公室，开会也没人叫，一度很沮丧，但薄不怕，他在桌上摆本《三国演义》，没事就读，把三十六计背得成竹在胸，把整过他的人刻在心上，他与三五个小哥们砍大山时说，妈了个比的，等我上去了，我叫他们都死。他把比字用京腔拉长，咬一口三十里堡农村书记孙广田送的苹果，仿佛咬坏的是唐副市长的心头肉，薄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而时常与其会面的大连甘井子区委书记班耀曰说，就你这个德性，要不是北京高干子弟，在大连你连个生产队长都当不上。薄很恼怒，但不敢发做，[禁书网](#) 只当做玩笑看待。当然历任大连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与大连人寿保险公司的老班，后来为此付出了残重代价，差一点做牢，这是后话。所以，做为一个外来户，薄熙来的仕途从金县始步，实属不易。

先去拜见金县黑老大

薄刚到金州不久，先搞民情调查，他背个一三五相机，穿一身蓝色趟绒衣服，四处走走，这里看看，那里听听，很快知道了这个小地区，与过去的呆过的监狱一般黑暗，不论书记陈美良怎么表演，生活中总有那么几个人，连公安局也惹不起，比如邹某与范某，邹某从监狱放出后不久，身上还背着命案，但又带着凶器在金纺一带横逛，他不仅打家劫舍，巧敢豪夺，还在开发区办了一步天大酒店，纠集了一批两劳释放人员，四处收取保护费，声势越来越大，薄在狱中结识过类似的人物，所以深知其用处之实。他亲自去拜访他，并很快成为铁哥们。另一个包工头子，成立了土建队，揽点建筑活干，正在软硬兼施，迫使官员分利给他，惨淡经营，日子难过，薄亦登门求见，立即臭味相投，成为拜把兄弟，后来薄熙来把他扶植成大连最大的企业老板之一。

在薄的眼里，中国原本就是一个大监狱，他从秦城监狱走出时，正是而立之年，他比照自身经历，深感权力的魔法，是非的不定，共产党相信暴力与谎言的作用，胜过一切，而监狱正是暴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高墙电网里，谁的拳头大，谁就是大哥，谁就能说了算。薄在后来的 1988 年任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长时，对一个处长叙述说，在监狱中，他年小体弱，饱受狱警与牢头狱霸的欺辱，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有一次被一个黑老大把他膝盖打坏了，设有药治，一度骨头都露出来啦，烂肉发出腥臭味。。。。。。但另一个与薄有矛盾的处级干部对我说，他死了才好呢，因为他与曼德拉全然不同，即然人家整他那么残忍，他为何有权之后反过 来，用同样不人道的办法迫害别人呢？在我看来，这不奇怪，薄熙来是主张以暴力解决社会问题的共产党的后代，他在监狱里得到的经验教训是，世界上设有对与 错，只有强与弱，强权者是狱老大，他讲的话就是真理。所以他要想在金县站稳脚跟，必须与当地吃得开的黑老大结成联盟，这是他的明智，亦是国人的悲哀。这正 是 80 年代中后期至 2000 年末大连以邹显为为首的黑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原因。

摄影爱好者

熟知薄熙来的大学同学很多，关齐云是其中的一个，他 1993 年以香港文汇报驻广州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假公济私，伪造自杀现场，携公款逃往云南躲藏长达 13 年之久，此前他因在大连筹办香港文汇报记者站与我有过短期接触，他介绍说，薄熙来在社科院读研究生时与其同窗，薄个高好运动，喜欢打篮球，与他兴趣相似，所以交谈机会不少，薄还喜欢摄影，但技术并不高。这一点 84 年以后我在大连多有耳闻，他刚到金县后不久，就背上一架老式 135 相机，去大连金石滩拍照{当时叫满家滩}，洗出照片后寄回家，叫薄一波拿给邓小平看，告诉他儿子在大连发现了历史悠久的葛斯特地形，金石滩应当建成国家级风景旅游区，薄家父子的用意是，搞个开发项目易于国家投资与银行贷款，又可以显示他的政绩。当然大连一旦有了一个理想的疗养圣地，就会吸引更多的北京高干去休假，这就进而为儿子搭建了一个政治上感情投资的大平台。

所以为扩大影响，薄熙来还希望他拍的照片，能在大连日报副刊发稿，但这并不容易，那时大连搞艺术摄影的人才太多，优秀之作层出不穷，而大连日报才对开四版，副刊每周才出一期。具体负责版面的编辑，我的同事韩建文，他又十分古板认真，对一县之长的摄影之作，并不高看，他认为这通通是习作，不够公开发表的水平，只有丢进垃圾筒。于是薄又托人找老编辑杨某某，杨亦摇头。从此薄对大连日报恨之入骨。这点酷似毛泽东五四运动前在北大图书馆当跑堂的经历，故薄在 1999 年对大连日报广告部下令调查并大开狱门，便不足为奇。

但他的摄影自有出路和用途，薄由此做为原始材料，呈送国家旅游局，吸引了北京一大批专家，到大连金县的金石滩参观，并构思了风景区的美好未来，初定了建设规划，并开始大兴土木。虽然薄的动机不纯，他的党羽借机发财致富，自己亦捞到不少好处，但凭心而论，薄把金石滩搞出了名，地价升了值。总之薄的摄影作品技巧不高，但在中共权力场，自有独特的作用。

扩建金州宾馆

80 年代初，金州当地的乡镇企业发展特快，这不是薄熙来的功劳，是赵紫阳与胡耀邦的对外开放搞活政策的结果，由于金县靠海，离大连又近，所以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很大，这便为薄搞政绩工程与形象工程创造了经济基础。

薄对金县的官员毫不掩饰地说，现在最大的事，是想办法把邓小平吸引来，住一两天也好呀！只要来了，吃好喝好玩好，再搞点海参带上，老爷子一高兴，设准给一大笔钱哩！金县的官员中附合他的人认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应当扩建金州宾馆，为接待邓小个子做准备，除大兴土木，还要四处选美，薄把前者叫硬件，后者叫软件，二者都要尽善尽美。薄当政金州 5 年，不论是财政拨款，还是乡镇企业画缘，反正向金州宾馆投入资金数目惊人，不仅扩大面积，而且提高装修档次，增加漂亮的女服务员，使它的接待能力大大提高。薄大兴土木，又给他的铁哥们搞到了生意，自己亦从中获利，这是一箭双雕，良性循环。知情者说，谷开来以办律师事务所发家，攒钱是从金县开始的，假如 1984 年薄熙来能象 2008

年在重庆那样大胆宣称，他的亲友绝不涉足本地生意场，该有多么令人欣慰。但可惜本人不能忘记，谷开来的律师执业，一直伴随薄熙来的步步升迁，从金县到大连，与权力寻租紧密相连，她到底发了多少不义之财，事情总会有清楚的一天。我印象中那时金州宾馆几乎成了他家的后院，不仅他本人与太太儿子经常出没其中，而且南来北往的亲朋好友吃喝玩乐，已是惯例。

尽管薄熙来每次回北京都要往邓小平家里跑，都必送上长海县海参与皱纹盘鲍，并大吹金石滩的蓝天白云高尔夫球场，但不知为何，邓始终未能成行，这令薄熙来有点失望。

不过设关系，薄又创办了金州向应广场，揭幕时把王震忽悠来了，也不容易，因为每来一个北京高干，都给大连以至辽宁各级官员肩上拍了一把掌：薄熙来在这，要多多关照。大连市委市政府领导，省委省政府一二把手，虽心里不服，但有理也不得不让薄一波之子三分啊。

在金州宾馆某个房间，形成一个小圈子，吃喝之际，死党云集，[禁片](#)谈论官场政治，臧否社会人物，也少了高人策划，一时间成为比市委省委消息还要灵通的地方，也是达官贵人，丽人老板光顾的沙龙。大连人戏称第二权力中心。

结党营私 培植自己的势力

尽管当地官员，有许多人瞧不起薄熙来，连一些乡镇企业的老板都不把他放在眼里，比如大连五湖轧钢厂厂长段世财就议论道，小薄不过是小嫩茬子，三年呆不上，就得灰溜溜地离开大连，因为没几个人支持他。但薄不退却，他爹告诉他，战争年代，革命江山是靠流血牺牲得来的，实在不易，现在和平环境要想接班，必须从最基层做起，有了政绩，他在京城才好讲活。而薄历经7年监禁，也耳闻目睹了狱中黑暗，狱老大之所以吃得开，除了上面有狱警的支持，就是自己心黑脸皮厚，拳头大。还得有一批追随他的死党。他认为社会就是一个扩大的监狱，各个省市就是带编号的监区，他是金县这个地盘上的老大，上面有老子摆平，已设问题，自己熟读三国诡计多端，也没大碍，关键是培植一大批能死心塌地替自己卖命的人，于是，薄熙来在不止一次地与小兄弟讲叙以上道理后，在金县各个乡镇大力寻求发现所谓人才，他选中的第一批人有孙世菊，孙广田，王传志，李德和，刘宪茹，白玉祥，车克民等，而对凡是与唐启舜陈美良等靠得近的人，都一一记录在本子上，立誓十年后报仇。为了控制这些小兄弟，薄用软硬兼施的两种手法，先故意搞出一些麻烦，让这些人身陷困境，再危难相助，抓住他们的弱点，逼他们图报卖命。这一着棋与狱老大一样。

有一段时间，薄下令大查当地非法集资案，一方面打击了不顺从他的养猪大王刘家奎，另一方面牵扯了副县长孙世菊的妹妹，因为农村多年来非法高息揽存情况严重，刘与孙二人都具有代表性，薄令公安拘押了刘与孙，吓得孙世菊不得不求情于他，而他又装出义不容辞的神情，亲自替孙的妹妹解围，这样一来，比他大几岁的副县长，便成了对其感恩代德的大姐，无微不至地帮助薄处理日常杂务，俨然是大管家。

车克民也是一个被其摘走灵魂的势力小人。他原为旅顺海军基地志愿兵，退役后回到金县农村，老婆有点关系，托人求情进了县政府大院工作，因没有文化，只能当厨师与司机，但由于对薄问寒问暖，体贴入微，又开车接送呱呱，又给薄家烧水做饭，从而博得了主子欢心，一个令，由工转干，成了司机班班长，后来薄又把他送他省市党校进修，提拔成科级处级干部，以至当上了大连国安局党委书记。不过，车克民紧跟薄的家人，象仆人一样全力以赴，设有自己的生活，很少回家，太太一怒之下与其离婚。

另一个死党的发现，更有趣，金县三十堡公社农民传言说，薄熙来有一次下乡路过村边，看到一个赶马车的中年人用崇敬的目光向他行注目礼，这人虽是农民，但身板挺直，目光深远，还穿了一件西服上衣，于是感觉此人气度不凡，下令其先当上了公社党委书记，又提升为副县长，成了左膀右臂。

有一次，孙广田跑到大连开发区海青街道属下的一个洗浴中心玩，与当地众多腐败官员一样，付费接受了妓女的性服务，不巧被派出所三个民警抓个正着。

开发区原名马桥子，属金县管辖，但后来分出去，与金县平级，所以民警与孙不相识，就认真地拘留他，他身为县长，又有薄后台，便不服，一边去派出所，一边争吵不休，一个民警朝他肩膀推了几把，还扬言：你咋呼个啥，嫖娼犯法哇！孙县长见了所长，毫不在乎，掏出工作证，使劲拍在桌子上，大吼一声，老子是副县长！

所长不买账，民警更生气，说：你狂啥，俺这是开发区，你当金县副县长，该俺什么事！你也管不了我们。另一个民警说，嫖娼犯了法，县长也不行，俺们啥也不怕！

孙广田抓起电话，打给薄熙来，正巧他在办公室开会，扔下文件，马上赶到派出所，这下子把派出所长吓傻了，谁不认识薄一波的儿子，但三个民警很惊讶：领导为什么是非不分。薄不但保住了孙，还谎称是自己派孙下去查案的，找小姐是谈话。民警问，怎么谈话竟谈到床上，薄大怒，骂民警不知好歹。。。。。。就这样，从此薄网络了一大批吃喝玩乐的哥们。这些人后来都当上了官。孙世菊当了市政府秘书长，孙广田当了公安局长兼副市长，李德和当了工商局长，刘宪茹当了税务局书记，车克民当了安全局书记等。

投其所好，建了高尔夫球场与紫阳楼

由于薄熙来真心实意地保护这批金县邦，所以小兄弟们对他死心塌地卖命，为了献忠心，他的部下在金石滩国家级风景旅游区入口处，修建了开荒牛雕像，表面上是纪念80年代初的第一批拓荒者，但实际上当地人知道，薄熙来49年出生，署牛，最喜欢牛，上有所重，下有所送，这牛至今还活灵灵地屹立在大海边。管委会主任王传志深知主子的爱好，自然匠心独运，投其所好，送其所要。

同样，薄对北京高层亦极尽阿谀奉承之事，80年代中后期，赵紫阳当国务院总理，他喜欢打高尔夫球，还有许多高干子弟当了老板，也热衷于这一贵族休闲运

动，薄为了往上爬，需要这样一个平台，就鼓动个体户，原在丹东商场卖彩电起家的任运良夫妇，在金石滩圈地创业，建成了全国最大的依山傍海的金石高尔夫俱乐部，并多次邀请达官贵人来此搞各种名目的比赛，还亲自跑到邓小平，赵紫阳等干部家，低声下气地游说他们成行。。。。。。他知道邓小平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就在赵紫阳身上打主意，命令金州的手下死党，在海边斥巨资修建一栋豪华宾馆，叫紫阳楼，他对一个管委会的领导说，小平来不了，总理来也行呀。把上面整明白了，省里市里那些王八蛋，根本不用理！

后来不仅紫阳来过，其它中央领导大都光临过金石滩，有的休假，有的视察，薄成功地借高尔夫球场拉开架势，向上级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与开拓精神，不仅争得国家银行贷款数亿元，用干炒地皮盖大楼修公园，种草植树，大搞形象工程，而且主动向太子党们送项目与利润，感情投资到了位，为日后步步高升做准备，尤其是薄的家人也以律师咨询为名，参与一些项目的论证与中介，大捞钱财，他的岳父谷景生则长年免费住在金石滩一家豪华酒店，由《东北之窗》杂志副总编宋协龙代写一二九回忆录。吃喝玩乐，怡养天年。

建农民铜管乐队，进京造声势

为了让北京的高干们欣赏自己的才能，薄熙来又指令金州德胜乡组织一支农民铜管乐队，一个姓林的所谓农民企业家被其破格信用，政府与企业不惜巨资，从北京请来音乐家手把手地教这些农民操管演奏，又打通大连以至北京新闻界大造舆论，把这支队伍吹得神乎其神，天花乱坠，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薄企图利用文艺表演吸引京城的眼球，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处在一个乱象纷呈人人表演的时代，他要当一个成功的政客演员，首先必须有一个舞台，而金州农民铜管乐队便可发挥巨大的作用。确实，薄作为一个政治戏子，适应了这个时代，通过铁的手腕，与精彩的表演，打败了陈美良以至唐启舜等政敌，伴随铜管乐声，开始向下一个台阶进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那时，我已由大连日报调入新华社大连支社工作，市委书记是毕锡桢，副书记是卡国胜，于学祥与傅万忠，从省纪委书记贬为大连市委副书记的高姿，只任职很短一段时间，他因与省科协一女子有染而受处分，下派辽河油田当党委书记，这些人当时对薄高升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无一人具有市长魏富海，副市长唐启舜等人的洞察力，大家均认为，建铜管乐队表明小薄没有大的能力与野心，依他的条件，只能抓抓文体娱乐，不适合主持大局，不止一个领导对我讲过，小薄不容易，做为一个高干子弟，在这里下派锻炼，吃了不少苦，他不懂农业，不抓经济，玩玩文艺，正是发挥自己的特长嘛！言下之意，不必看重此人。甚至有一个副书记对我说，他干上五年，镀上一层金，就好走啦，比如广州啦，深圳啦，上海啦，当更大的官！再不在国家部委任个职也好。总之，看透他的人不多。

走政府系列受阻 险些翻船

最先，崔荣汉承诺薄一波，拟通过政府这条通道，把儿子一步步提上来，但第一步不想就梦断在大连开发区，上级任命薄熙来为副书记，但遭大部分官员阻挡，

以至他灰头土脸只能退守金县待命。这时，他的反对派，常务副市长宫明程等人向他发出了猛烈进攻，使他险些翻船。开发区的创业者大都是从市委市政府调去的官员，也有部分外来户，他们不欢迎薄的主要原因，是继深圳之后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急需脚踏实地做事的人，比如基础设施方面的七通一平等，必须有内行专家规划论证与建设，而薄显然不适合这个环境，有人认为他抓宣传工作或许行，但主管宣传部的干怀让也不喜欢他，特别是第一批舍家撇业扎根开发区的干部，在唐副市长关照下，互为默契，共度难关，一块排斥他，使他成了无人领导的挂名副书记，而恰恰班子中又无朋友，所以当王传志，刘宪茹等几个机关职员，在走廊见到他打个招呼，点点头时，都令他受宠若惊，终生难忘。后来这两个人都在他高升大连市长后得到破格重用。

前进受阻，后退无路。80年代末薄熙来惨遭滑铁卢。金州的干部以陈美良为首，在市委主要领导支持下，也在其背后落井下石，向他发难，大家以薄不懂农村工作与乡镇企业经营为由，批评他整天背个相机东游西逛，一会搞农民铜管乐队表演，一会建什么关向应广场，再不就搞什么美女模特学校等等，他们说，这些花架子即不能使田里长庄稼，又不能使金州的乡镇企业增加经济效益，而且劳民伤财，百姓厌恶，所以数十个地方官员联名上书市委省委告他，建议有关部门调出此人，另做安排。与薄同时从北京来的张某某脸皮薄，立即自行要求到市属某企业工作，从此淡出官场，但薄熙来另有绝招，他派年轻貌美能说会道的太太谷开来四处活动，对一些地方官员展开妇人外交公关，她先求情于市委书记毕锡桢，但设被理睬，毕是一个循规蹈矩，坚持原则的人，他绝对不会喜欢薄这样华而不实的公子哥，但碍于薄一波的权威，又不便赶他离连，就叫她去找副书记高某，高很忙，秘书刘晓滨让他坐一个钟头冷板凳，尔后才由高出面接待，假如高亦把她拒之门外，薄熙来的仕途可能就此完结，但悲剧恰恰产生于高某人性中的善良与心软，他做了故事《农夫与蛇》中的农夫，并被女人的眼泪迷住，当他耐心听罢谷开来的诉苦，又在脑海中闪过那些上诉信的内容，虽然凭借他多年在省纪委任职的经验，他判断材料属实，薄熙来的确不适合当官，特别是当农村县城的父母官，但问题是，关键之时救人一把，胜造七级浮图，高某出身于辽宁抚顺一贫寒之家，文革中因协助过落难的老干部全树人而后被其提携重用，在李贵鲜出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时曾任省纪委书记，但后因天性好色，生活不检点而被贬任职于大连，这时或许高某除了行善，亦可能同病相怜，才温情细语安慰谷开来，并答应帮助薄度过难关。随后他召见了薄，并把金州，开发区等相关干部找来，耐心协调，引导，奉劝大家从大局着眼，宽容薄熙来，这才使他转危为安，但此后不久，高某被与其有暧昧关系的女人之夫书信告发，受了记过降级处分，再次贬任辽宁盘锦辽河油田党委书记，所以金州官员再次告发薄熙来的风波卷土重来。

请人打立柜 耍赖不付加工费

继高某之后，原辽宁省委书记许少甫的秘书卡国胜，由辽阳市委书记调任大连市委副书记，主管纪检监查工作，虽然表面上他是二把手，但由于特殊背景，连书记都让他三分，可见其权倾一时。这时一封举报信放在他的台面，使他震惊而又颇费思量。此前这封发自金州的控告薄熙来的信，已经一把手批转于他，精明的卡一看便知，这个信肯定已被下面的纪检监查的人办过，并查证属实，只

是老谋深算的一把手不好办，才推给他。他便再次批给具体办案的人下去查，得到的答复 果然证明了自己的判断。

那个时候，大约是 1988 年左右，金州有个木匠为薄熙来家打做了一个大立柜，三开门的，原木色，还用了三层板，上面刷了亮油，当时这个家县很风行，薄住在金州由陆军士兵站岗的一个大院里，太太很少来看他，他经常由部队的交换台与其通话，据消息人士称，薄对木匠说，为迎接老婆赶造这个家县，连工带料 200 多元，这价当时已是不菲，薄在完工后以质量不合要求为由拒付上述款项，故不知何人将此事告到市纪委，有人怀疑是县委书记陈某，但薄后来念念不忘，查 找多年未果。

卡国胜与高某不同，他是一个从政经验十分丰富的人，他不一定出于善良与宽容，而是出于仕途与职责，他读过上告信与查证材料，亦决定放薄熙来一码，因为他认为没有必要为一点小事给自己在北京高层树敌，假如他父亲薄一波通过省委讲他的坏话，对下一步自己的晋升不利，中组部有意调他到青海任更高的职务，他 正在权衡。再说，即便赶走了薄熙来，他爹也会换个山头安排他，说不定这年轻人将来有了出头之日，我还用得着。但不论怎样，这笔钱当时数额不小，若算受贿罪 也不轻，放了他也应当叫他领情。于是卡书记召见了薄熙来，他一口一个卡叔，叫得很甜，笑得满脸谦和，高大的个头弯得象个虾米，看了信件并不惊叹，只是连声 认错，说自己离婚后被前妻纠缠，经济上一直不宽裕，不是不想付账，而是暂时囊中羞涩，等回去后立即清账道谦。就此，卡原谅了他，又在关键之时，救他一把。

当时，我在新华社大连支社做新闻工作，与卡的儿子为大学同窗，太太原在辽阳市政府外事办做译员，与卡书记工作上有交往，所以我经常可以去他办公室聊天，有一次他谈到上述有关薄熙来情况时说，这件事查证属实，但我想，做为一个北京高干子弟，从大城市来到大连这个小地方，人生地不熟，艰苦创业，从基层干 起，不仅要摆脱前妻的家庭纠葛，而且要顶住地方官员的嫉妒排挤，这很不容易，所以占点小便宜，固然不对，但也不是严责。我注视他的眼睛，感受到这位副书记 的对人的宽容与包涵的感情，但我还是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即然到农村基层当了七品芝麻官，就应当廉洁奉公，借权势占木匠便宜，是索贿受贿行为，没有任 何理由自辨。卡书记也说，我已批评了他，但你想想看，崔荣汉推荐他来大连，他在金州干了几年，总不能因为这一件事，而得罪了那么多人啊！说完，他在办公桌 前站起身，久久地朝窗外望去，面目表情凝重深沉。我理解他作为中共体系内官场一员的尴尬处境。

开联欢会，与薄同台表演

1989 年薄熙来经过 5 年努力，终于获得提升，由金州区级干部，调到市委宣传部任部长，远离了那些厌恶他的农村基层干部，但对中共大连市委官员来 讲，他们第一次有了危机感，可能由此时起，他们不再相信，他干几年镀一层金就会走人的传言，因此大家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三个副书记，即于学祥，卡国胜，付万忠都变得警觉紧张起来。

大连新闻界为薄举办了欢迎会，我印象中是在市委办公楼北院小礼堂，由大连电视台台长李宝侠主持，薄熙来穿一件蓝色风衣，眼大体健，谈笑不止，显得风度不凡，主管宣传的副书记于学祥也参加了聚会，由于我与于的秘书林书彬颇有交情，所以会上，于与我多做私下交谈，会上还进行了即兴文艺表演，李宝侠曾任大连日报文艺部主任，与我较熟悉，就提议由我朗读一首诗，我推辞不掉，便朗诵了已故诗人郭小川的诗：

树上的百灵美在嘴

山中的老虎美在背

我们这一辈

美在内。。。。。

大家拼命鼓掌助兴，包括薄熙来笑得象个大孩子。但我想他未必能听懂我的用意，实际上我在用这首诗提醒薄熙来，到基层工作，贵在实干，即便是在市委宣传部，也不要搞表面文章，应当注重实效。但似乎薄这个人并无悟性。或许在其内心深处，根本不屑于倾听不同的声音，何况它发自一个小记者。接下来，辽宁日报大连记者站长刘镇源清唱了《北国之春》，引起全场大家共鸣，然后由薄熙来唱了一曲《我是一个兵》，显然他相当紧张，唱得太快，节奏零乱，歌词不清，声音亦太低，但新来的部长能够亲自唱歌，大家都很高兴，纷纷热烈鼓掌，把晚会气氛推向高潮。大家希望以后他能给我们创造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上任一个月，撤换了四个干部

由于我与王志强等人是大学同学，个人私交很密切，所以经常去宣传部做客，他当时任外宣处处长，还有王心雄等任职于理论处以及其它几个处或办公室，因此我的消息很灵通。大家告诉我，薄熙来上班没几天，就凭个人直觉与喜好，把一些干部撤了职，根本不与组织部门打招呼，也不与其它副手商量，这一举动震惊整个机关大楼。

有一个司机养尊处优惯了，给新部长开车也一如既往，不仅懒散骄横，而且热衷了解薄的私生活，那时谷开来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很少到大连，但他任宣传部之后，她多次乘机抵连与先生相聚，这位司机天性好奇，接送谷开来时爱寻根问底，使薄恼怒，特别是他们夫妇小别如新婚，难免讲一点怕人的私房话，便用英语交谈，司机很生气，为了知道他们究竟在讲什么，就偷偷进了英语班学习，不料有个拍马屁的，把此事告密于薄熙来，他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紧，便怀疑有人暗中指使司机监控他，就设法找冠冕堂皇的理由，排斥这些人，他发现司机与四个处级干部多有来往，又习惯午饭后打扑克，立即以整顿纪律为由，在一个午后召开的全部人员大会上，忽然宣布这些人立即下岗，其中一个人，是办公室主任姓姜，女性，对他平时不太恭敬，立即就地免去副处级干部，把她吓了一跳，也把她气得要死。有一次已调到大连教委任职的这个性情泼辣的女子对我说，

薄熙来没有组织原则，想撤别人的职，最起码要与其它副部长以及组织部干部处沟通，但他根本不经这个必要的程序，仅凭个人观点发号施令，她本人是受害者之一。多亏被撤职后她有点社会关系，调离了宣传部。那个原本是科级干部的司机，最惨，被撤职后只好停薪留职自谋生路。

其实，组织部与宣传部仅为一墙之隔，薄熙来如同在金县一样，根本不把同僚放在眼里，他下令撤了四个人的职，是杀鸡儆猴，立即宣传部的干部一面倒，这些惯于看风使舵的人，立即用最华丽的辞句吹捧薄熙来，纷纷围着他转，也把薄熙来喜欢的人，全部安排到报社，电台，电视台与杂志社，出版社，谷开来也成立了所谓文化民俗研究所，一方面吸引投资赞助，一方面网络人马，安插亲信，他们喜欢的人，连美协书协作协等群团组织的主席职位，也纷纷占领。总之，薄熙来深知舆论先行的的重要性，便拉开一个很大的架势，首先为自己准备意识形态领域的人才，大造声势，抓住阵地，连篇累牍地炒做金县经验，为下一步高升奠定基础。

六四事件，险些打碎太子党的美梦

至今六四事件过去了20年，当时有许多内幕还不是很清楚，但有一个情节是公认的，包括薄一波在内的老人党，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决定了要动用军队坦克残暴地镇压北京的民主运动，而身为太子党的薄熙来，自始至终坚定地站在父亲一边，即站在独裁者一边。他的父亲薄一波愧对恩人胡耀帮，因为正是胡主政时，果断地为其平反了所谓61人叛徒案，使其东山再起，也使其子薄熙来日后才有出头之日，但薄家两代人都是忘恩负义的小人，为了升官发财保住权力，可以出卖灵魂，朋友，良知，这一点从以下情节又可加以佐证。

六四期间，谷开来大都在北京，薄一波的司机拉她上街办事时，不幸被戒严部队士兵的流弹击中身亡，谷开来安然无恙，因此照理讲，他们应当恨主张戒严镇压的邓小平，但恰恰相反，薄家父子冷漠地对待司机之死，却认为在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应大义灭亲，坚定地站在党与政府的一边。而失去权力的赵紫阳，已不是总书记，薄熙来立即下令黑石滩的紫阳楼改名，令当地百姓惊愕，人们说，名改了，但这一切不能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呀。

我还记得大连著名的海碰子作家邓岗给我讲的故事，六四期间谷开来来到大连，邓去机场接她，因为那段时间，谷开来附庸风雅，愿意与文人墨客为伍，她拉住邓刚失声痛哭，一边哭天抹泪，一边讲叙北京血案。。。。。显然那一刻她做为一个女性与北大法律系毕业生，还良知未泯，但在见过新任宣传部长薄熙来之后，立即变得冷若冰霜。后来，邓刚也不再覆述这段亲身经历。

薄熙来对在金州结交的哥们说，如果邓小平不果断平暴，把这些反革命分子杀光，抓起来，我们这些哥们怎么办？接近他的人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薄在六四前后，每天都与其父长时间通电话，跟踪了解北京政局变化，他最担心的就是学生推动的民主运动获胜，因为那样中国民主转型成功，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局面将会改变，薄家父子将退出历史舞台，可能还要被清算与追究官倒的刑事责任，所以，

薄从切身利益出发，坚定地执行邓小平江泽民的决策，在大连的新闻出版界，严肃地 清除了一批同情学生的异己分子。

他下令把凡是参加游行，支持学生的编辑记者全部调离，有的还记入个人档案，不再重用。借这个机会，薄把众多金州农村上去的文人，培养与安插到报社，电台，电视台等重要岗位，为自己造势做准备。以大连日报为例，原先的骨干张某某被逼下海经商，金县教师出身，才能平庸的王某某当了副总编，总编，原文艺部 女编辑马某由于家住金州，与薄的某党羽有亲属关系，立即受到重用。她不仅在副刊排挤了著名散文家素素，而且与谷开来攀上干姊妹，两人来往频繁，连与薄熙来 吵架的家务事，也求其协调，可见其关系密切。后来此人，薄不仅亲自下令奖给一套房子，还任命为大连《新商报》总编。惯于溜须拍马的郭某某，则当了宣传部副 部长，《东北之窗》杂志社长等。

创办《东北之窗》要当东北老大

薄在宣传部任职时间并不长，但大胆创办了经济政治综合性月刊《东北之窗》，可谓用心良苦。首先，是刊号问题，由于国家新闻出版署与辽宁省新闻出版局 管理严格，审批难办，按规定大连报刊数目已满额，所以，薄就选软柿子捏，下令大连科协创办的报纸《发展战略报》停刊，而把刊号让给《东北之窗》，此前我与 该刊联系很多，也常为其撰稿，据该刊负责人叶其成表示，这个报社的人员整齐，报纸创办较早，团结了一大批读者与作者，在全国同业信誉良好，但薄为了一己私 利，下令解散了该报，损失惨重。

为了大造声势，《东北之窗》从一创业，就摆出一副全国大刊的架式，刊名由邓小平题字，薄熙来求助父亲向邓小平求教，并谈了杂志社市场定位的事，邓表示 感兴趣，还答应了他们父子的要求，接着又获批准刊物为正局级，这一点非同小可，因为总编社长等人均为局级干部，立即吸引了全国同级文人的目光，表面上看，薄要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人才，实际上他要摆脱地方势力的掣肘，为自己下一步高升寻找对自己设有个人成见的吹鼓手，很快招聘了袁世超，吴某某，宋协龙，杨 道立等追随者，这些人为薄书碑立传大造舆论，一时使其名声大噪。

不久后，此刊不仅推出以谷开来名义发表的长文《我为马俊乍打官司》，而且还有她的题为《胜诉在美国》的著作，但其刊内部知情者透露，这些令人肉麻的 自我吹嘘文章，全部由东北之窗一些文人代笔，同时薄的小兄弟们还利用该刊广告经营权，以赞助为名，到处搜刮企业钱财，并形成内斗不止的局面，无一不因为广 告提成争利所致，惹上多场官司，多次在大连民事法庭败诉，在大连搞得声名狼籍，直到 2006 年由史卫国接任总编，才改变了形象。2008 年有一天史卫国 对我说，怎么搞的，以前这么多官司，从未赢过。。。。。。但这个原任《党员生活》杂志的总编不敢批评薄熙来，只能欲言又止，他不得不在薄这个高官调离大连 8 年后，才艰苦奋斗，为其揩净屁股，改变了杂志社连年亏损的局面。薄圈养的某些文人，靠他的淫威胡作非为，用这本刊物编造了多少谎言，换取了企业多少广告 款，或许永远成迷。这里仅举一例，原工人出身的孙其某，在《东北之窗》应聘期间，拿着介绍信，走遍东北三省，见过一大批省市干部，拉回了十多万广告款，自 己也从中获利，而且凭借刊物便利，结识了黑龙江省私营企

业主张某，后改聘企业副总，结果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均一夜大变。2008年，我在其豪华办公室见到薄一波与其董事长等人在北京的合影，可以想见此人及其老板与薄家父子关系非同一般。

王启星求薄办事 薄却两面三刀

王启星是新华社大连支社社长，80年代中期是我当时的上级，但由于辽宁分社把我的编制暂存市委政研室，所以我的工资变动，必须求助于市委领导的批文，于是王代我去见薄熙来，他说他以前与薄相识，王的父亲王彪是新华社总社老摄影记者。他本人曾在北京新闻学院进修，我相信他们的交情。至今我还保存一份以新华社大连支社名义上报的文件，上面有薄熙来的亲笔批示，其内容是赞同理顺我的工资问题，并充分肯定了我工作成绩，总之薄当时做了详尽的批示，字迹很狂放，很潦草。那天，王启星从市委回来后对我说，薄熙来对你宣传大连所做的成绩，做了言辞肯定的批示。并指令大连市人事局具体办理，但依照县体程序，我还必须去找市人事局，但由于薄才到大连市内任职，人们对他日后的发展估计不足，所以在人事局三楼一间办公室，某处长对这个批示不屑一顾，并说叫他给我们局长打电话吧，这般无奈，我请示王启星，王同意我再去找薄，次日我清晰地记得是上午9点左右，我到市委宣传部见薄，他不知何因，却对我十分冷漠，接过我递过去的文件看了看说，我知道啦，又还给我，我讲明来意，又把市政府人事局电话给他，他扫了一眼，也不接这张纸条，并说自己正要与同事谈工作，很忙。我说谢谢他，真不好意思，为这点小事麻烦他，他一言不发地走了。我想起当初我去金州时他对我的态度，很是惊讶。他假如不同意办理此事，就不必给王社长这个面子，即然批了，就应当跟进处理好，人应当言而有信，这次打交道，使我相信了一些金州干部的传言，薄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说一套做一套，阳一套阴一套。我想到了市委书记于学祥，他是老实人，从不这样对待任何人与事。虽然这是一件很具体的小事，但我认为，只有认真办小事的人，才能办大事，只有通过办小事，才能全面了解一个人。

1984年中国散文学会在江西芦山召开一次文学讨论会，邀请我参加，但大连日报文艺部主任张德言不批，我又找主管副总编郭东斌，也不批，怎么办，当时我年轻气盛，非要去不可，便去见市委副书记于学祥，我不认识他，只在报上得知，他由大连工学院调到市委任副书记，主管文教，很快我见到他的秘书林书彬，林很认真地记下我的请求，一天后报社领导找我说同意我去了，但未讲明原因。。。。后来借工作之便，我经常面见他，问起这件事，他还记得，他说大连文学人才不多，能去芦山开会，应当支持嘛！

由于书记想到薄熙来，两个人比较，真的不一样。我明白了，薄在王社长的文本上批示，是冲着新华社这个牌子，并非出于助人为乐的真情，他出身于宫廷，于学祥出身于农家，虽然都是共党分子，但本质品行不同。这是一个人根本的不同。

后来设办法，我去见人事局长。正巧，新任局长原为原瓦房店市委书记宋有成，我此前曾在《半月谈》内部版发表一篇题为《宋书记三下永宁除三霸》的文章，写得正是这个人。他以前在任职瓦房店市委书记时，亲自到永宁乡，下令公安镇

压了三个黑社会头子。他看了薄的批文，说这个无所谓，我给你办，因为不违背原则，而且我们还是朋友。。。。。。

通过这些亲身经历的故事，我感受到薄与上述这些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如果这个人当了大官，他会做出怎样的事情，由此即可以做出判断。

正式迁居大连 附庸风雅

在我的记忆中，薄熙来一家人正式迁居大连的时间是1988年，此前4年间，他一会儿在金县，一会儿在北京，两个地方飞来飞去，反正乘飞机从大连到北京才45分钟，他有公款报销，根本无所谓。从严格意义上讲，他在金县设有家。谷开来对外界讲，她是薄到金州后与其相识的，这是谎言，据原香港文汇报驻广州办事处副主任林某某披露，早在北大读书时，薄熙来就经常去看谷开来，那时他与前妻尚未离婚，谷开来称其与傅仇到大连访问金石滩时，被下派干部薄书记吃苦耐劳的精神打动，才与其相恋，显然不确。

从当了大连市委宣传部长之后，谷开来与薄的家人，更确信了薄熙来的政治前程，换句话说，薄一波在中南海与江泽民私下进行了交易，资历浅薄的上海滩跑江湖的江泽民，急需中共原老薄一波在背后支持，特别是利用他在军队中与张震等人的老关系，操控国家机器，六四事件使他认识到，唯此唯大。反过来，长寿的薄一波深知自己由于健康原因，不仅不得不淡出政坛，且难免一死，必须赶快培养儿子薄熙来，江泽民承诺，他只有从基层干起，才好为其讲活，所以薄由金县到大连，是他人生历程的转折点与里程碑。谷开来是一个处处想拔尖的精明女人，也由夫权大变看到了生财之道，赶忙成立了律师事务所，至于他们的小家庭的琐事自有拍马屁的人代管。

他们把家选在大连老虎滩附近的海军大院，原因有二，一是空气清新，依山傍海景色优美，二是大连水面舰艇学院里面安全，外面有全天24小时岗哨，惯于与人民为敌的薄熙来，最怕别人暗害他及其家人。三是吴胜利当院长的海军大院，是中国海军舰艇营长以上干部的摇篮，此处信息灵通，与这些人结交，有利于日后在中共高层发迹。四是福利待遇好，做什么都不用个人买单。

薄当了中国的宣传部长，才是个市委常委，但派头大得等同中央领导，不用讲他个人，光他老婆谷开来，本来是个没有任何个人资历的小律师，却有一个专职秘书叫赵某，赵某原为海军大院中薄家的隔壁邻居，由于主动热情帮忙，感动了谷开来，找到了一棵大树，从此成了薄家另外一个全职管家，当然薄的生活秘书还是车克民，工作秘书是吴文康，据说这个住所亦是当过海军战士的司机与厨师车克民具体选中的。

薄在大连水面舰艇学院筑巢，架子不小，出入有专车，前后有保镖。挂警灯，响警笛，横冲直撞路人侧目。谷开来喜欢与文化人交往，亦不甘寂寞地直接插手大连文联的人事安排，把自己看中的人推荐到肥缺的位置上。她本人跟画家张兴君学画山水，儿子还常到陶艺家邢良坤家学艺，当然这一切都是无偿的，他这一雅兴，把一大批同级的官太太气得要死，因为市委书记毕锡祯与市长魏富海的太太，

都是目不识丁的家妇，副书记于学祥，卡国胜，傅万忠的太太都是没有什么特长与业余爱好的机关职员，同时又把众多趋炎附势的画家羡慕得垂涎三尺，因为有了部长大人亲自提携，半吊子艺人亦能走红，劣作也能价值连城。谷开来不仅经常出席类似公关活动，而且办了所谓中国民俗文化研究所，笼络文人，互相吹捧，设有账号，名利双收，尤其是在大连日报副刊部，直接安排自己的亲信，原金县人马某当了领导，排挤另外学有专长的著名散文家王某某等人。

破坏了大连官场规矩 污染社会风气

80年代中后期的大连官场，虽然也有一党执政缺失监督形成的诸多问题，比如官僚主义严重，办事效率低下等等，但有一点是我亲眼所见，没有任何一个市级领导干部的太太直接经商，我由于善于交际，有许多朋友，所以去过许多领导家做客，比如崔荣汉，魏富海，于学祥，卡国胜，傅万忠等，他们的太太我都接触过，应当讲他们大都既不喜欢出风头，亦不看中钱财，往往生活过得很清贫，有的上街买菜，不得不与小商小贩讨价还价，这种场面我巧遇过很多次。

由于那时，我的人事关系在市委办公厅下属的政研室暂存，又在新华社做级别最小的驻地记者，所以谁也没有必要提防我，我四处乱窜，广交朋友，即使他们有心防我亦难，因此我当时目击的东西应当属实。有时，我回到位于大连市西岗区高尔基路27号的新华社大连支社吃午饭，因为没有自己的食堂，必须与王启星等人一起，穿过人民广场到附近的市政府大楼食堂去，也会与那里的官员聊天，我从未听说过哪个当官的太太经商发财。1988年伴随薄熙来的步步高升，谷开来在大连建起律师事务所，堂而皇之地大做生意，自此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局面，此后大连历任领导干部直系亲友经商捞钱的风气，一发而不可收拾，人们说，你看北京来的薄一波的儿媳都这样干，我们不捞钱还等什么，捞了还怕什么？于是从科级，处级到局级市级，再到市级个个干部家属都抢钱红了眼，人人争学谷开来。毕锡桢书记的儿子，在斯大林路繁华地带，入股个体户杨某某的公司，办了餐饮等综合性的娱乐城，公安局副局长韩某某的儿子韩某办了桑拿浴与地下赌城，魏富海市长的女儿与香港老板薛某某办了房地产公司，在大连开发区大建标准厂房出售，等等，一时间大连群众议论纷纷，怨声载道，而大连新闻界在薄的直接操控下，全用假大空的溢美之辞，掩盖现实。薄以六四时表现情况为借口清洗了原先一些比较正直，专业水平比较高的新闻从业人员，把得意的亲信朋友安插在报社，电台，电视台，出版社，杂志社等要害部门，还通过他提拔重用的原大连日报农村部编辑，后来的社长，宣传部部长王某某，严密监视中央级省级驻大连数十家的媒体负责人，让他们感到恐惧，只能一个声调唱赞歌。这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带坏了干部队伍，而且使社会分配不公现象急速加剧，两极分化变得十分严重，官民矛盾警民矛盾不断激化。而这一切又全部隐藏在谎言之下，成为社会矛盾积累的随时可能燃烧的引爆点。

挤走林庆民与傅万忠 为自己开路

大连消息人士指出，薄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期间，一方面表面上讨好老干部与同僚，见了毕锡桢书记叫毕叔，见了卡国胜副书记叫卡叔，见了于学祥书记叫学祥，

另一方面却经常去北京活动，叫上边大官对下边小官施加压力，先是把原市委宣传部长林庆民下派到金州当书记，接替薄留下的空缺，再在三个副书记中间，寻求生存空间，算计整走哪一个。

当时毕书记名义上是大连市一把手，但其人原毕业于大连师专，为人拘谨严肃，又胆小怕事，起不到太大作用，而卡国胜虽从辽宁辽阳一个小城市调来，但因在省委有背景，故大权在握，再加上为人真诚，心胸开朗，所以人缘不错，紧追其后，辽阳市副市长李玉臻等人相继调入大连任副市长等职，亦足以说明他的权威，所以薄熙来先紧紧靠上他，不间断地找他汇报工作，还与其儿子主动示好拉上关系，不论在公私什么场合，都把卡叔挂在嘴上，听得我身上都起鸡皮疙瘩，有一次卡书记对我说，小姜呀，熙来这个人真不错，爸爸那么大的官，一点架子也没有，象个可爱的大男孩！由于我与卡书记的儿子是好朋友，所以与他讲话不绕弯，我说：他是看你对他有用！卡书记笑而不语。他的双眉很浓，眼睛很大，总象带着温情的泪光，这与薄的眼中闪射的凶光截然不同，这一切至今恍然如昨。

相反，对同事，年龄与之相仿的傅万忠可不是这么恭敬。虽然傅是副书记，官比他大一级，但傅原在大连造船厂当领导，是当技术员起家的，跟工人混久了，难免土气，薄来自首都北京，名牌大学毕业生，骨子里流的是皇族的血，所以很少正眼看他，两人连话都不曾讲几句。在当了一年多宣传部部长之后，薄通过北京高层关系，又挤走了傅万忠，在没有任何迹象，他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上级调傅去沈阳当省审计署长。由于我与傅颇有私交，他有什么想法也不避讳我，对此他想不开，他愤愤不平地对我讲，这个调动，是为了挤走我，给小薄倒地方。果然不久，薄踏上了又一个政治台阶：副书记与副市长，如同节节高升的火箭。

抓住历史机遇，名利双收

现在国内外人士对大连形成一个思维定势，即大连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变，是薄熙来倡导的好，干得好，但据我多年来近距离观察，这并不是事实。这种错误的印象是薄任宣传部长后压抑媒体的结果。他软硬兼施操控媒体，使谎言重复 100 遍变成了真理。

1989 年至 1993 年他从市委宣传部长调任大连市副市长，这时才按照他父亲的旨意，绕过大连开发区这一级的阻力，战败了唐启舜，步向了政府系列的轨道，离市长这梦寐以求的目标近在咫尺。薄对过去金州时的哥们私下说，要狠狠地整唐启舜，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软蛋，他才是混蛋。于是拍马屁的人，纷纷向省纪委与中纪委等写信，告老唐有经济问题，并抓住开发区中法合资炼油厂这个项目的失误，频频向唐发难，过去的区市官员嗅到风声，特别是看到薄的上升趋势日益凶猛，便纷纷倒戈，大连市常务副市长唐启舜一气之下，还没等人家把他这个政敌关进大牢，自个竟身心交瘁，一病呜呼。薄对手下一个哥们说，死了算了，别忘了当年他怎么待我，把我当傻蛋捏，真便宜了他！

实际上，薄家在京城离权力与信息最近，早已清楚城市土地有偿出让这一改革的新政策即将出台，并非魏富海设本事，而是计划经济时，市长手中设钱，大连城

建只能靠财政拨款的年代久矣，巧夫难为无米之炊，这方面读者可通过《大连地方志》查看相关数据，我只写我亲身经历之事。薄熙来当市长以后，大连与以前的根本不同，在干土地政策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前是无偿划拨，以后是按地段论价，当时各种法规又不健全配套，正是圈地捞钱一举两得的千载难逢之机。薄熙来与太太谷开来均为大学毕业生，亦与其它土八路官员不同，他深知抓住这个机会意味着什么，也会用合法的外衣保护自己，他们商定，一个批地皮交朋友往上高爬，一个挂牌收费捞钱不算受贿。但在大连新闻界无人不晓，他们的伪善与贪腐，不比沈阳的慕马弱，只是别人敢怒而不敢言而已。

开来律师事务所是什么东西？

80年代后期，律师业悄然兴起，但大连地处沿海小城，490万人口中，对律师业有清晰认识的人不多，所以时常有律师找我，向我哭诉揽活难，律师界风气不正，有的人给予中介高价回扣，有的与法官暗渡陈仓，为了生存，千万百计，根本没有道德底线，可见生意难做，然而谷开来一挂出律师所的牌子，立即顾客盈门，有些大生意推不出去，大连司法界人士愤愤不平地对我说，假如她在深圳开办律师事务所，不在大连当地经营，这问题不大，但她在自己老公当权的小城市大连就地开业，会形成怎样一种不公平的局面呢？一方面是法院对她承办的民事诉讼案件有理亦让三分，谁都怕薄大人公报私仇，另一方面是财大气粗的企业，无一不希望她做为自家的常年法律顾问，以便借机向市长进贡，做感情投资。这样名正言顺，也不违法。

在大连市中山区青泥洼桥的百丽大厦，即现在大商男店原址，有谷开来租用的写字间，分别位于两个楼层，其一度还有与美籍华人，大连荣誉市民程某某合搞的所谓大连惠瑞斯顾问投资有限公司，可见规模不小，气派不凡。由于当时正巧我的一个亲友，正巧在其楼上的某贸易公司工作，所以我对该所生意兴隆情况，多有耳闻。

1998年，香港文汇报广州办事处调来一个新同事，与我满谈得来，她姓林，有一次在广州开会闲聊，她称与谷开来为北大同学，在一个寝室住过，关系不错，故我回大连前嘱我去代为问安，并修书一封，但几天后当我去拜访谷的律师所时，谷竟让一个叫赵丹的秘书接待我，并不在意林某某的室友之情，只留下书信不做回复。可见其心地冷漠与失礼。而且还发生以下兴师问罪的突发怪事。

当日午后，当我驾车离开百丽大厦之后不久，我还在外面公干，市政府查办处处长宋某某便带领三四个人，急匆匆赶到大连沙河口区民权街348号天河公寓18楼，即文汇报东北办，值班小姐称，宋某某出示了工作证，问我在不在，去开来律师所干嘛，态度很凶很傲慢。后来我想了一下，她的公司肯定存在相当严重的经济问题，只有心虚胆肥才敢派市政府查办处的人跑过来恐吓我。而能够调动市政府查办处的人，只有薄熙来，这件事不单没吓倒我，反倒激起我揭露这家公司的极大兴趣。

另有多人告诉我，谷开来这个公司原挂牌在开发区，现在业务发展过快，才迁到大连，并已在北京，香港以至美国都有据点，势力雄厚，行动诡秘，人才众多，

生意很好，在大连影响力日见强大。1999 年大连大学教授，著名书法家于植元对我说，薄熙来当市长，老婆开律师事务所，你说大连还哪有法律？

排挤宫明程 暗斗魏富海

1989 年至 1992 年薄熙来给市长魏富海当副手，另一个与之竞争的人是宫明程，是常务副市长，即在魏出差时，由其主持工作，但薄从不按照组织程序，向他们做汇报，而是处处显示自己，越权发号施令，使魏市长形同虚设。实际上，如果他心黑手辣，多点谋略，便有机会整肃薄，但可惜魏是个办事老实认真的人，出身于工人家庭，从小受家庭教育，父母就告诉他做人要有道德底线，这就使他与喜欢三国权术的薄的争斗，始终处于劣势。

魏富海是老大连坐地户，原为大连化工厂技术员，工程师，后任厂长，化工局长，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来的，其在 80 年代上半期当政时曾被百姓戏称魏四蛋，即市场凭票供应每户 4 斤鸡蛋，不过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都是这样，这不能怪他。但他天性厚道，不善自辨，也不会包装自己，这使他与薄相形见绌。

不过就我经历的两件事，可以看出魏富海的性格特征。他当市长时，我家从大连火车站前的友谊街 1 号搬到中山路 224 号 2 楼，当时是农牧业局职工宿舍，但不知为什么，煤气久拖不上，搬迁新居后多有不便，在市农牧业局工作的爸爸，打电话给魏市长告状，他根本不认识他，只知道市政府的电话号码，不料第二天魏富海一个人亲自来了，他还打开阀管看了看，对我说等明天办吧，结果次日准时工人上门兑现承诺。这种情况在薄上绝对不可能发生。

另一件事更有趣，金州石河子镇有个农民企业老板叫石大胆，什么都敢干。那几年，区政府年初与农民签订合同，按较高的价收购他们种植生产的葡萄，但到了年底，葡萄赶上大丰收年，产量太多卖不出去，政府竟撕毁合同，把果农拒之门外。这种言而无信的传统，是薄熙来在当地留下的，农民怕薄动用黑社会，那时不敢闹，现在薄离开了金州，就在背后暗中鼓动他们闹事，石大胆带领 10 几辆大卡车载满葡萄，聚集在市政府大院，给魏富海施加压力，对此新华社记者李某某发了内参，参到政治局，副总理田纪云做了批示，这使魏很丢脸，他很生气，有人劝他找个理由抓记者泄愤，魏富海说，你们坑了农民，民众闹事，记者报了，抓记者干啥？抓了能解决葡萄积压的困难吗？当然这些记者也不先打招呼，就捅上去，真不够朋友！因为那时新华社大连支社的人，每天都到市政府职工食堂吃午饭啊。。。。。。由此可见魏市长为人还不错。

薄与之不同，他是有仇必报之人，他不仅整垮了唐副市长，还私下唆使一批金州的哥们，盯住宫明程的亲友不放，咬住他们在开发区经商的事，步步紧查，宫明程是个聪明人，知道挡住薄熙来仕途的严重后果，就断然辞职，主动要求到国家粮食部下属企业中国北粮集团任董事长去了。

然而，薄在政坛上软硬兼施，两手交替，把三国演义中的合纵连横术运用得炉火纯青，他把市政府的老干部排了个队，知道副市长袁某某最有资历与人缘，于是

又在崔荣汉退休之后，与袁套近乎。60年代时胡明任大连市委书记时，袁便是常委，薄深知他的份量。

事有玄机，袁某某的女儿在春海热电厂当领导，与另一男性上司发生矛盾，不知为何关系紧张，达到先杀人后跳楼身亡的惨剧，留下一个不及10岁的小女孩，薄见机行事，带着谷开来，主动到袁副市长家，声言要收养此女孩为义子，令知者动容，并举行了正宗的领养仪式，闹得满城风雨，但数年后自己翅膀硬了，等袁的影响力渐微之后亦设了大权，此事不了了之。但不管怎样，在当时薄熙来收养未成年弱女子之举，为已得分的确不少。

上述这一打一拉，左右逢缘，薄熙来在1992年至1993年又当上大连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这种党政一肩挑的干部任命情况，为历史仅见。这时的薄已打败了大部分政敌，大展拳脚的机会终于到了。

与电话号码一样多的选票

薄熙来挤掉其它人，登上大连市长宝座之时，正逢香港文汇报在大连建站之际。文汇报原先选派的筹办人是广州办事处的主任关齐云，其毕业于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曾与薄为同学，1993年关齐云在大连带着官方批文，与我一同去找薄，薄借故推辞不见，后关因经济问题假冒自杀现场，逃到云南昆明藏匿12年后投案自首，2005年被判刑，至今还在狱中。由此我接过这个烂摊子，创办了东北办事处，本来按照上面规定，这个办事处下设哈尔滨，长春等三个站，故理应在省会城市，但因我家在大连不愿赴沈而使薄熙来受益，原本国务院新闻办批复香港文汇报，在哈尔滨设点，但我据理力争，并拉了大笔广告款给香港文汇报，故使这家香港报纸办事处落脚大连，而雄心勃勃的薄熙来则立志海外招商，重塑大连，正急需文汇报为其大造舆论。故双方一拍即合。

尽管就我个人来讲，对薄设有太好的看法，但报社领导要求我，把个人成见与报社工作区分开来，为得到办事处首席代表兼高级记者这份收入不菲的工作，我们的报纸必须为大连的改革开放甘当吹鼓手。

上任不久，我就参加了一次选举市长的第十一届人代会，开会前有人在场内外暗中散发传单，其内容是指责薄熙来自任职大连代市长以来，出卖大连的土地给北京权贵，从中渔利，搞形象工程，种花种草不干实事，弄虚作假，欺骗上级等，并配有一副漫画，画上是个子高大的薄熙来，背着一个大麻袋在奔跑，满头大汗，他表情象沿街叫卖的商贩，滑稽可笑，上面写一行大字：薄熙来把大连整个卖了！这个事立即被国安特工报告薄，他顿时大怒，命令公安人员展开调查，以破坏选举罪，严惩罪犯，但当时的公安局长是王永奎，他与班子人员研究后认为，这构不成犯罪，查到亦难办，但又得罪不起薄熙来，便巧妙地以设有查到为借口，拖而不办，薄素知王局长是于学祥线上的人，就气愤难忍，一边参加人大会，一边寻思讲话稿，虽然上级已任命他为唯一市长候选人，但漫画事件仍然提醒他，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存在，还有许多人在暗中捣鬼，所以他叫车克民等特务，监听一些代表的手机，知道他们的选举意向，该拿钱摆平的拿钱，该恐吓的恐吓，该请客吃饭的就吃饭，总之仔细地计算选票情况，生怕有任何闪失。

好在，大连的人大代表，大都被薄的死党或金钱买通，或畏干恐吓，在会上表决时过了半数，而且正巧 411 票，这使自信心大增的薄熙来喜出望外，权已在手，又是 4 年，这才是扬眉吐气。薄说，漫画的事，慢慢地查，跑不了！

至今事过境迁，年头已远，但我还能记得，人代会在大连中山广场的人民文化俱乐部举办，薄熙来说，我得了 411 票，还少 10 几票，但不要紧，省委支持我，群众支持我。大连的电话号码的地区号是 0411。。。。。。许多人都笑了，包括卡国胜，高姿，于学祥等人，他们笑得不同寻常。

显然，在薄熙来看来，0411 的地区号与 411 张票之间有一种必然联系，这叫天意，出身于北京高干的薄不认为自己当官是靠老子，而是君权神授，是民意支持，此后他之所以做出许多与他在北大所接受的教育完全对立的丑事，均与他骨子里的这种封建意识有关。

在香港明报首次介绍薄熙来

由于我调到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工作，按照中共国安局内部规定，我的电话就被卫星定位 24 小时监控了，这是 2000 年 12 月 4 日被捕后知道的。

虽然我个人无意干巴结薄熙来，但我喜欢发布新闻稿，我觉得深入生活的过程，特别是采写与发表文章的过程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于是我撰写了一篇题为《薄熙来当选大连市长》的新闻稿，大约 1500 字，我还引叙了薄关于他一生要刮三场台风的讲话，他说他属牛，每到本命年就想刮台风，他就要为老百姓办一件大事。。。。。。我还生动地描绘了大连人大选举的情况，以及他对 411 张赞同票的想法。此文发到明报后，马上就接到夏泰宁的电话，他说他是中国版负责人，报社副总编，他认为文章很好，可以刊发，他本人亦是学新闻的，与薄熙来是大学同学，也很认识与了解薄熙来等等。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 1984 年薄熙来亲口告诉我，他有许多同学都分配到了海内外各地媒体工作。

这篇文章非同小可，当时薄熙来默默无闻，虽然在大连政坛已羽毛丰满，但在香港及海外，人们还没有人另眼关注他，我是出于个人良好的愿望，发表这个稿件的，我也没有计较，夏泰宁在发表时为什么不属我的实名，我也奇怪，薄的死党后来与我翻脸，在两次对我抄家时，为何没有取走这份手稿与打印稿呢，如果不是疏忽，他本人读过会有所启示吗？会良心发现吗？因为用这篇稿件比对我后来发在《前哨》上的稿件，可知我对其原本并无成见，对其我存在一个认知与变化的过程，我一直在把他当成新闻人物观察与写作，如此而已。做为一个文人，他做得对时我表扬，他做的错时我批判，何罪之有？

后来我多次去香港，见过夏泰宁，也谈过薄，夏说那时有很多人读过上述文章，都对他寄托厚望。当然与中共所主持的文汇报相比，香港明报是小巫见大巫，我指的是有关薄熙来的报道数量，如果查阅自我加盟文汇报之后的中国新闻版，薄与大连在海外的知名度的确增加了不少，但是随着我对其人不断了解与本质的逐步认识，我对其的评价由褒到贬发生了质变。

但不管怎样，上述一切都在薄熙来及其党羽的掌控之中，他们正在张开触觉的无所不在的大网，全面而细致地了解我的情况，讨论决定对我如何利用，当然薄熙来躲在秘密特工背后，是最终抓我的决策者。

厨师司机当上了安全局领导

薄在当市长之前，处于他人的制约下，还有所顾忌，现在当上实际上的一把手，有了权，首先是在重要部门安插亲信，他知道大连国家安全局的重要性，虽名义上是反间谍机构，但可以公器私用，打击政敌，排斥异己，所以薄立即疏通北京国家安全部的关系，亲自点名叫车克民任大连安全局长，但市委书记于学祥不同意，他们操控人大不批准不任命，薄亦不怕，改任车为党委书记，叫软包蛋万国涛当局长。

万国涛个头瘦小，贼眉鼠眼，是个见义望利的小人，早在辽大读书时即在外语系被人耻笑，因为他从某农村上的大学，不知为何，班里一考试就不及格，不及格就哭，同学们都对其不屑一顾，但不想此人毕业后进了大连国安局当了特务，有人说是由于他在大学喜欢暗中举报同学被选中的。说来也巧，安全局长万国涛与我太太是辽大同学，不是一班，但同为一届一系，毕业后太太在国旅工作多年，办公楼与安全局不过十米，所以大家很熟。

据我所知，在万之前的局长姓马，他人还较正派，有人曾问我我在香港发表的文章应定位什么性质，他认为属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为此他在大连日报还发表了一篇文章，但薄把他劝退后，万国涛接手局长，就一切听命于书记车克民。而车把进口的现代化反间谍设备用于内斗，不仅监听于书记等对立面的电话，而且他自己的仇人亦难逃其网。车还在大连湾里乡做房地产生意，用监听电话方式，掌控生意伙伴。

据大连著名律师陈某某披露，薄与车私下列了一个黑名单，把政敌全部拿下，不惜动用多名秘密警察，个个单线联系，对反对过他或有可能挡道的人或跟踪，或监控，一一记录在案，以便网络罪后，编造证据，拘捕下狱。

这还不够，薄熙来指使车克民把特务安插到法院，检察院，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等等，形成了枉法追诉一条龙的高效的体系。这就是说，薄想抓谁，他就能合理合法地把谁送进监狱。想放谁谁就能仅凭薄一句话重获自由。于是整个大连在经济繁荣的表象背后堕落于白色恐怖之中。比如韩某某被拘押，便通过太太找薄的死党刘某某，刘过话给薄，薄立即下令放人。在薄当政的日子里，类似丑闻不断。

第一次与车克民相识并请他吃饭

大约在 90 年某一天，大连日报政法部记者陈序平打电话给我，说薄的秘书安全局书记车克民想与我认识，我说没问题，因为陈不仅与我是大学同学，又曾是

报社同事，彼此关系不错。此前陈经常到文汇报驻东北办的办公室找我，亦常留我处吃午饭，所以常来常往，无话不谈。但出狱后我才知道陈的特殊身份。

那天，我们约见在大连付家庄山跟底下一个小饭店，只有我，陈序平与车克民，我不知道一个人的电话还能被它人监听，更不知道他是奉薄之命与我交往的，我在明报刊发的文章已引起他们的高度关注，但我还蒙在鼓里，以为安全局是要通过我，向我手下的员工进行保守国家秘密的教育，我对车开玩笑说，哪些东西属于你们规定不能公开报道的秘密，请早点告知，以免出问题，他说不是这个意思，并转移话题，大肆吹捧薄熙来的丰功伟绩，说他很受中央领导器重，朱镜基近曰又把 他叫去中南海谈工作，江泽民更是有意栽培他，还说薄到他家很方便，象走平道一样，想什么时间去就去，想谈什么也无所谓，还说薄比胡锦涛有能力，有魅力，有 前途。车还不厌其烦地介绍薄熙来在金州时如何吃苦，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扎扎实实地苦干，才一步步走过来的，他又怎样被其感动而舍家撇业跟随他干等等，因为 年事久远，有些细节已模糊不清，但总的感觉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仆人，薄是一个大野心家。

酒酣耳热之时，他还说薄与他一同去北京，一般情况下，不管多大干部，设宴请客，请谁都能准时到位，他们为了搞好关系，请过很多人，就一个人牛气，是 胡锦涛，请他请不动。车克民说，胡锦涛不如熙来，从气质，能力，人品，外貌，他哪个方面也不如薄市长呀！他把尾字拉得悠长，我看到他白圆的一张脸上，目光如炬，泛着红光，使我想到清朝宫廷的太监李连英，我想，薄熙来能把一个厨师司机培养成对自己忠诚的安全局书记，的确不简单。

车书记还开玩笑地说，反正我也不被地方政府管，大连安全局直通部里，我们怕谁？他得意地讲着，脸喝得通红。我大方地抢先结了账单，他说等过几天我再 打电话给你，约个时间回请你，还安排薄市长单独接受你一次采访活动，他一边写给我个传呼机号码，一边说以后我们就是弟兄啦，有事尽管呼我。但自此没了下文。

不料，时隔多年，薄熙来派他将我在寓所附近停车场拘捕后，驶往距离此饭店1000米左右的大连华能宾馆门前，稍事停留，再换乘另一辆秘密特工的面包车，转往旅顺海军基地看守所关押。而此人恰是在旅顺服过兵役的海军战士。他就是这样回敬我的宴请的。

大连市政府大楼第一次设了岗哨

我从80年代中后期由马栏村迁往西岗区福德街60号，而此寓所与市政府大楼仅一路之隔，我时常围绕大楼散步，我亲眼目睹了它的硬件与软件的变化，前者指围墙护拦，后者指人员服务，以前在魏富海当市长时，大连市政府那栋米黄色的大楼门前不设警卫，谁都可以走进来，过了大门，只需在楼梯口告诉一个更夫，我记得他大约60多岁，个头很小，脸很尖，翘嘴巴，牙很白，只有他问：你找谁？你告诉他找谁，即可以获准入内。回想一下，那时聚众楼前吵闹的事极少发生。我想，虽然与我当年同事的新华社大连支社的记者大都已经退休，但除了邢立夫过世，其它人都健在，那我们常去市政府办公楼食堂吃饭，谁都有同感。

自从1993年薄熙来入主市政府大楼之后，情况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虽然主政修建了众多广场草坪高速公路与大楼，还下令扒了原劳动公园与星海公园的砖墙，使其变成通透敞亮的公共场所，我对此是肯定的，但他也是第一个用铁栅栏与接待室以及围墙，阻断了老百姓与政府官员直接联系的市长。他颁布的一切政策大都与人民群众为敌，都是为权贵阶层与知识精英服务的，是做表面文章的，因此，政府大楼正门前不仅设有一个班的士兵，以升旗降旗为名，进行24小时的警卫，外来人要先到传达室电话预约才能入内，而且在市府大楼西侧设有可移动警员岗楼，它实际上是一辆汽车，却装饰得象房子，里面坐满警察，日夜停靠在那里，随时应对访民与突发事件，总之，从薄开始，大连市政府官员是藏在堡垒里领导这座城市。而在市政府大楼两侧，一左一右的两栋建筑，一个是法院，一个是公安局办公楼，都对这种刺刀下的经济繁荣与假民主保持沉默。

为了装潢门面，薄熙来当了市长，还经常在早晨8点30分之前，带领几个副市长，站在大楼门前的水泥台阶上，与外来上班的职员握手，然而，不用说他用围墙切断了与群众的联系，即使对与其握手的一般职员，也违背国家有关政策，多次不给人家提薪，这亦是导致他们权钱交易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手里有权又收入微薄的官员更易于贪腐。

为文汇报刊发的一则小稿恼怒

1993年初，筹备文汇报之时，我编发了一篇短新闻，内容是有关大连交通事故概况的，本来它最先公开发表在大连日报上，文章说近期大连发生的大小交通事故，上百起，严重的数十起，我只不过是为了完成稿件数量，编转而已，但不料薄熙来读后，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香港及海外敌对势力，在他履新市长之际，搞的破坏活动，他批示给宣传部长王会全，王是惯干拍与屁的人，深知自己从大连日报小记者爬到常委兼部长这个位置不易，便对我施压。

以前，我与王会全个人私交不错，因为早在报社农村部时，他就与王智博关系最好，90年代初王智博移居加拿大多伦多之前，我曾与王会全一同到位于大连湾的王智博亲友处参加了他小舅子的婚礼，特别是1992年王会全以大连市委宣传部长身份拜访文汇报，张云枫社长接待他时，问起我这个人如何，他曾美言了几句，因为当年我写信给香港文汇报自荐，假如设有他的首肯，我后来不会被副总编刘永碧等报社领导重用。

现在王部长很生气地批评我不听话，他说你刚上任，就揭大连的疮疤，就臭大连，以后怎么办？随同刘永碧到访的外联部主任陈桂雄一再劝我别这样干，并要求我向他道谦，结果我照办了才息其怒。我念及他对我的协肋，心虽不服，也只有忍气吞声。

此后有一年春节前薄熙来请记者吃饭，地点在大连宾馆，市委宣传部新闻处长叶枝盛通知我去，我想这应当是一个彼此沟通感情的机会，为了文汇报的工作，我可不不想与他继续顶牛。但到了餐厅一看，一共请了六个记者，等了好一会儿，薄才姗姗来迟，其中有光明日报孙言荣，经济日报李天斌，新华社李晓林，中央电

台 李朝奋，大公报孙玉光等，人不少，但他只与李小林与李天斌讲话，三个人有说有笑，对其它人很冷淡，并在席间大讲如何给经济日报批地皮，让他们在八一路搞房 地产等，还指责有的报纸有意臭大连等等，一点也不倾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使我心中很不舒服。

我多么想直言我的想法，象 80 年代初在金县见到他那样，让我们有一种平等的感觉，以便我们交流，但他根本不看我，也不认真听取其它人的意见，中途 还被吴秘书叫出去两三次，虽然那顿饭全是山珍海味，鲍鱼大虾，美酒佳肴，价格不菲，但胸中块垒，如哽在喉，味同嚼蜡。我想，薄熙来心胸狭小，是绝对不会忘记那篇不足百字的小稿的事！他请我们吃饭，又故意冷落我，是在警告我，在以后的新闻报道中只能种花，不能挑刺。看来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今天请客吃饭，要 得就是这个叫人尴尬的效果。

但我不怕，我即然做记者，不当官员，不做老板，又不由地方政府管，何必看他的脸色行事？所以以后几年的春节聚餐，我也不参加，有时叫助手应付，久而久之，我便出局了。好在东北办地盘很大，大连的薄熙来不认我，我去吉林或哈尔滨，那里的官员与我联系密切，我可以到其它地方去呼吸新的空气。

建办之初接触的两个官员之比较

文汇报建站之初的故事，也颇有戏剧性：曹伯纯从湖南株州调大连任一把手，薄由副市长升为市长即二把手，但两人各在中南海有靠山，性格又十分相似，针尖对麦芒，必有一伤。干是从如何接待香港文汇报来访领导的态度上，可以窥视两人的不同体性。

关齐云失踪后，我在文汇报副总编刘永碧，王伯遥支持下，艰苦创业，筹建了东北办，我在市委宣传部的同学王志强对我很好，所以一听说刘要到访，便同意 上报薄，他说看看薄市长能不能接见她，但很快又说设有空，我知道薄就是这个爱摆架子的德性，我不看重拜会此人的事，但无奈刘永碧很好面子，觉得薄不见她，回到香港不太好意思，所以我很为难。正好，我另有办法，我电话联系陈序平，请他转告曹书记，说文汇报副总编刘永碧一行到访大连，能不能见她。不料，很快陈 答复我，曹书记十分高兴，还要安排在大连棒棰岛宾馆高规格宴请我们，这样我算是完成了应酬的任务。

此后不过一个小时，宣传部副部长刘国良又改口，说薄也答应次日上午见我们，但大连日报的新闻稿上只能讲是薄市长接见刘永碧一行，绝对不能象报道她与曹书记相识那样叫会见，实际上对我来讲，接见也好，会见也罢，这都无所谓，只要能见两个当官的，能有一个人点头同意办站就行，反正等刘永碧一走，还是我负 责，我便可以比较自由地从事新闻工作，官场上的怪事，我不在乎。

第二天上午 10 点，薄熙来约我，刘永碧，陈桂雄三人在市政府三楼见面，我知道他不会准时到达，果然他又迟到十分钟，以示他日理万机，高人一等。他还 故意让我们去旁听他主持的一个座谈会，坐席上全是街道老太太，他正在倾听这些小巷总理的诉求，只有我知道这是有意安排给刘永碧看的，因为这种会以前他从

未开过。等开完了这个会再接见我们。当然这个秘密，我不能告诉刘永碧。凡是不了解薄熙来的人，都不会相信。

从两人比较看，曹书记为人相当真诚，不搞两面派，但薄头脑中封建等级观念太重，一会说见，一会又说不见，这反映出他缺乏平易近人的善意，喜欢玩权术，最初不想见，看曹书记见了又怕人家抢了风头，因为他知道见了后，香港文汇报不可能不发消息，那样会叫曹书记抢了头筹。而在大连日报的相关报道中，他又在细节描叙上指示记者写成接见，这是上级接见下级，借此与曹书记以示区别，而曹书记根本不计较这一切。我当时还不太了解曹，但从此事足见两人之明显不同。

婉拒薄市长恩赐的一块地皮

经济日报大连站长李某某，原为大化集团公司的宣传部干事，在企业做久了，很有商业头脑，他先对薄先是大肆吹捧，做感情投资，后是以建站为名申请地皮，薄心领神会，给足面子，批一块在大连中山区八一路一带的地皮，是一类地。叫钻石地带，这是好大的人情。然后李某某再通过工作上的便利，寻一个财大气粗没有地皮的企业搞联建，盖成大楼后，白分一半，卖光后记者站变成了富翁。这种空手套白狼，权钱交易的做法，是典型的新闻腐败，虽然臭名昭著，但屡试成功。

在此之前，这个勾当，辽宁台大连开发区站做过，新华社大连支社做过，一个叫田某的女人盗用人民日报辽宁记者站的招牌也干过，这使建站初始的香港文汇报某领导亦跃跃欲试。所以有一次在大连，刘永碧向薄提出了这个要求，薄毫不犹豫，一口答应，他说一定给文汇报最好的地方，并要最低的价格，还建议我们先给他打个报告，先给刘国良，再报他批。刘作为大连宣传部副部长，得到薄熙来的信任，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同爱摄影，二是当年在宣传部时，刘国良对他亦步亦趋，言听计从。

会见结束后，刘永碧认为这次为文汇报办了一件大事，我也感到高兴，但我后来仔细思索之后的结论是，假如这样做了，香港文汇报就在经济利益上与薄连为一体了，很难再保持媒体的独立性，而且报社领导离开大连后，我得去具体操办，会惹上很多麻烦，我不懂房地产，难免聘用其它人，管理又太难。特别是这样做，将违背新闻自由的理念，后患无穷。但我的一个朋友说，你应当抓住这个发财的机会，你一旦拿到这个好地皮，转手卖掉光回扣款一项就很可观，一辈子都够了。但我深思熟虑，不为所动。

于是我对这件事一直拖而不办，此后不论港馆领导询问，还是地方官员催办，我都说慢慢来，正在办理，时间长了，大家心灰意冷，最后不了了之。

炒地皮 利益集团撕碎了大连

回想大连以前发生的故事，大连人难忘刘德才，70年代初刘以双重身份威震大连，他是驻军司令亦是大连革委会主任，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一把手加上二把手，当年他的专权也很厉害，但其下台的原因与罪名是大盖楼堂馆所。而上边领导指责他的所谓馆所就是原动物园对过的小小所大连渤海饭店。

斗转星移，20多年后，同是共产党的一市之长，提出建设北方香港的口号的薄熙来，大炒地皮猛造声势，盖得每一栋大楼都要胜过渤海饭店10倍，然而这却变成了骄人的政绩与步步高升的资本。这就是形势的变化使然。古人云，此一时彼一时也！

薄熙来是个政坛上的演员，他最了解身后的布景，布景就是国家的形势，因为他家族的成员，曾直接参与了国家经济政策的颁定，所以这种与权力，信息最近的便利条件，使他粉墨登场恰逢良机，他选择的不是齐齐哈尔的舞台，也不是昆明的舞台，而是大连的舞台，因为大连看客多，易炒做，有钱攒，出名捞取资本快。而炒地皮时，美丽的滨城则是最好的道具。

在薄任市长之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土地由无偿划拨变有偿使用，名义上公开招标，实际上他一支笔定夺，而卖大连地皮，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忽悠大连，或者好听一点讲，是宣传大连对外招商。

恰恰在这一点上，薄熙来独具特长，他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生院毕业的硕士生，而且又当过宣传部长，同时这个演员又一表人才，伶牙利齿，风度潇洒，口若悬河，于是他通过媒体把大连炒出了名声，地皮值钱了。自然可以待价而沽。

然而，真心实干的人默默无闻，比如说原大连水产养殖场旧址，现在的星海湾商务开发区，是大连经委副主任李某某带头干的，我经常去他简陋的办公室与工地，那时招商困难，李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仅靠一台挖掘机拼命干，每天中午只吃一个方便面。。。。。但后来地皮炒热了，他被调走了，薄安排亲信郑某当上了房地产开发办主任，这个人给他顶门户，实权掐在自己手中，有意让北京的高干子弟与权贵集团成员以及金州以至大连的亲信，买个好价钱，攒了第一桶金。最初，是高干子弟在开发区搞所谓五彩城，引进二手设备建磁带厂等，坑骗中方，攒了一大笔钱，后是抢滩有利地段，名为开发，实为炒地，撕碎了大连城。

而站在舞台上，大肆叫卖的人，就是薄熙来，他不仅通过卖地结交了外商，也巩固了与北京权贵的交情与互相利用的关系。同时太太谷开来开办的所谓律师事务所亦大发横财。这个活跃在政坛上的表演天才名利双收。

郑某曾是我帮助过的朋友

90年代初，房地产开发办主任，是一个令许多官员垂涎三尺的肥缺，薄熙来选由郑某当权，自有他的道理。我比任何人都了解郑某，是指其发迹前那段历史。他曾是我的朋友，80年代中后期我帮助过他。

郑某原为大连城建开发公司副总，副科级，这个公司的上级是城建局，他是大连的部队干部子弟，我的一个亲友与郑是朋友，也曾任在部队任职。那时公司的一把手姓滕，搞违规开发，被毕锡桢书记下令追查，我曾去调查报道此事，郑某向我诉苦，后又通过我的亲友找我，要我介绍他们认识卞国胜书记的公子，我便给他们引见了，后来他们都成了更为密切的朋友。更为有趣的是，郑某设有文凭，与我那个姓彭的亲友一道找我，要上辽宁大学历史系函授就读，我有求必应，不仅给他们引见了靳某某老师，还代付了报名费。。。。。。然而就是这个交情，到了90年代后期，郑某先抱住副市长李振荣的大腿，后又靠上了薄熙来，立即翻脸不认我了，连在房地产展销会上见到我，都装做不认识，形同路人。

就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小人，却被薄选中重用，他一步步从副科级到处级再到局级干部，明里是他及其所属的房地产开发办公室，在依据国家的土地政策，办理地皮审批手续，但实际上每一块地皮都由薄一个人一支笔签字，他只是一个具体办事的傀儡，但郑某有一个特点：有奶就是娘，过去大连城建大权在城建局长邱某手里，后在副市长李振荣手里，他就与这些人走得很近，等前两人退休了，他巧取豪夺了邱的房子，又把笑脸转向薄熙来，甘愿死心塌地为他卖命，但郑某有一点很精明：嘴紧，保密。薄让他把一类地卖给谁，价格多少，背后有何交易，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证明，但薄早就用经济利益堵住了他的嘴，他们是一条线上拴的蚂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在中共高官中，最早充分知道土地出让能获暴利之人，唯薄熙来莫属，而且他刚从监狱放出来不久，又刚从大学毕业，故能高智商地暗中以权谋私，所以与郑某一拍即合。其实郑某也是在利用他，所以他才甘当薄的替死鬼与挡箭牌。这个故事以后再讲。

薄家父子的精心策划

薄熙来登上大连政坛，原本就是一个阴谋，它折射了中共两代野心家篡党夺权并想世袭的一枕黄粱美梦。六四大屠杀之前，赵紫阳曾在一次会议上直言批评薄一波与左王邓力群等人，但六四后他因为主张武力镇压而重新得势，虽然党内对其恩将仇报胡耀邦的恶行多有议论，但邓家与江泽民还认为他有用，可以利用他的老资格为他们打击反对派服务，所以薄一波很吃香。与其说，薄为了共产党的政权不变色而主张血洗天安门，不如说他是为了儿子能继承父业，千秋万代坐在人民的头上做威做福而站队表态。

大连接近薄熙来的人说，薄对金州的哥们说，六四学生运动不镇压，我们怎么办，基层人人如参加选举，能选咱哥们吗？没有权力，谁理我们，大家吃什么？。。。。。。在六四之后，薄多次对他信任的人讲，幸亏有老一辈革命家做后盾，能调动军队，该抓的抓，该杀的杀，才压住了反革命势力，不然就完了。

如果说六四前对官倒的规模与形势，他们还有所顾忌的话，那么六四之后中共太子党，从最初的倒卖批文，贩卖设备，走私贩私，发展到公开圈地炒卖发国难财，薄熙来是继邓家之后尘，又一个即得利益者，标志着共产党在丧失政权合法性之后，进入了黑社会化的权贵主义的新阶段。

薄熙来首先在小平南巡之后，为邓质方所开办的首钢四方集团提供方便，让其在大连大肆贩卖土地使用权，接着又为陈云的孙子在大连港医院旁边提供地皮建别墅，尔后王震的后人建开发区美食城，李铁映的儿子力践在原来大连歌舞团旧址盖帝王大厦，后改为远大大厦，。。。。林林总总，不胜枚举，薄家父子老谋深造，稳操胜券，他们深知，用国家的地皮每拴住一个高干，就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多一张嘴，就有人为自己讲话，而且自己捞钱也不怕它人告发，反正纪委都怕这些老家伙。再说包括纪委在内，几个人干净？

因此，真正了解薄熙来的人说，他不想离开大连，因为在大连有实权，可以用土地交人发大财，不仅老婆孩子跟着沾光，而且老岳父常年住在金石滩了宾馆颐养天年。年年都有大连地方官员赴京给薄老送礼，每次都是市政府秘书长孙世菊带队，假如老爷子高兴写个字，润笔费一次没有10万8万的，根本拿不出手。听说光给齐齐哈尔大北集团李小二题字，早收了不少银子。

扒小房动用黑社会，王有林当上备用替死鬼

自从薄熙来当了市长，大搞城建，大兴土木，处处扒小房，盖大楼，铺草坪，建广场，报上都吹好，但隐藏在城市背后的掠夺贪婪与残暴，却鲜为人知。因为薄对操控媒体是绝对的内行。

以前在大连大街小巷，有许多民宅连带一些耳房，大连人叫偏厦子，别看它小，养活一大批人。有些下岗工人通过偏厦子办食杂店，小饺子馆，书报铺等，养家糊口，其乐融融，也就是说，对弱势群体来讲，这个小天地是生活的全部希望，何况，当年或租或建偏厦子，又出钱不少，还要打发城建人员的人情费，所以，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反对扒小房，为了城市建设可以扒，但要慎重。要给补偿。

然而，薄家远在京城，从小娇生惯养，不了解民间疾苦，也根本不会为老百姓着想，为了个人政绩，为了与老板勾结，公开掠夺百姓财产，他一意孤行，果断决定在大连扒掉全部小房。

有的幕僚提醒他，这件事了不得，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薄说怕什么，把警察准备好，闹就抓，不老实往死里打，他还密令黑社会分子分片包干，从中提成，让他们直接参与动迁。薄说，钉子户狠狠地整，绝对不要让步。要拔掉所有的钉子户。

为预防万一，他想出一个绝招，叫新上任的房管局长当备用替死鬼，王有林个头高高的，言语不多，当过市政府查办处长，对薄提拔他由处级到局长，感恩戴德，便愿意随时牺牲自己，薄告诉他，扒小房表面上以你的命令为准，一旦出了事，闹成大乱，就公开办你平民愤，但不要紧，你会另有安排。薄把这个丑行亲口告诉我，有一次在接受我采访时，大言不惭地把这种强奸民意的欺骗行径，叫做政治智慧。

果然此后持续半年多陆续进行的扒小房举动，造成大小 30 多起群体性维权事件，自杀致残致死多人，拘捕关押数十人，以至其中有数十人常年进京上访，但当地媒体被薄熙来勒住了脖子，不能发声，造成大连民怨积累，1998 年后我在香港《前哨》发表文章批评他，就是民意的首次舆论井喷。

薄在扒小房时，不仅利用王局长，而且还利用了大大小小道上的地痞，无赖，小混混上百人，这些人分属不同的黑帮，占据不同的地盘，原本已渗透千家万户，这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多次杀人被枪毙的绰号叫虎豹即邹显为等人，亦参与其中，并大获经济利益。特别荒唐的是，前去八一路一带搞动迁，协助警察驱赶住户的，不仅有城建局的，派出所的，而且还有狱警带队的大连灰绿岩监狱的犯人，他们被命令穿上便装，对坐地户钉子户进行恐吓，殴打，中午得到的酬谢是美味佳肴与减刑奖励。2005 年我在大连南关岭监狱服刑，有一个当年参与此次运迁，后来从灰绿岩调到此处的姓薛的犯人说，那次他还借机与一个小姐打了一炮。。。。。。但我不能证实。不过，薄及其手下的马屁精，动用黑道人物对付拆迁户，在大连已不是秘密。我在两个监狱三个看守所呆过，与数十个黑社会成员或头子交谈，确已证明。

令薄高兴的是，王有林局长虚惊一场，替死鬼没用上。大连老百姓整体上，比他估计得要温顺得多，大部分人对运用警力与黑社会动迁，除了极少数人，都忍耐顺从，只不过有的人心怀不满，郁郁而终，有的人指桑骂槐，在背后诅咒他，但薄熙来是共产党员，不相信有来生恶报。我想这与大连人历史上曾被日本人统治了 40 年，俄国统治了 30 年，传统上民众有太多的耐性，不无关系吧！

重用打手彭某某，火车站前横行霸道

火车站是大连的脸面，外地人到大连第一眼看的就是它，薄熙来很重视这个脸面，就三令五申，要求政府各部门，重抓整洁与治安，这都无可厚非。问题是他所信任的彭某某，自从担任了站前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以来，好事干得少，坏事干得多，特别是在当了市人大代表与公安局巡警支队政委之后，利用手中的权力，凌驾于所有其它政府部门之上，对遍布大连大街小巷的小商小贩，或非正规出租车，三轮车等大肆抓捕，野蛮殴打，非法拘禁，对其个人财产公开抢夺，毁弃与私分，还滥收费乱罚款，硬扣车，以至多次使百姓伤残甚至死亡。

笔者因工作需要，与其多次交谈，他对所有媒体，不论大小，十分热情，有个媒体的记者吹捧他，他一高兴，送一台车给他，反正这车也是他设收的。除了车之外，他设在大连宝莲酒店旁的办公室什么都有，从瓜果梨挑到服装鞋帽到自行车摩拖，只要大连街面有的东西，应有尽有。原本这些罚没物品，都是商贩的血汗财产，也是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一家人老小生命之所系，生活之所望的东西，即便不应当在政府明令禁止的地方设摊摆点，也应当好言相劝，批评教育，更应当把这些物品严格立账清点，一一交还。然而彭某某依仗薄的权势，恃强凌辱，欺压百姓，用暴力手段，驱赶商贩，全开抢劫，其野蛮行为，已成为大连火车站前一景，让人见证当年的人权状况糟糕之极。

薄重用彭某某等人，还有另外目的：搜刮钱财。他向北京权势人物请客送礼，有些钱财政上不便列支，便急需灰色收入，而彭某某的综合办罚款名目繁多，地域广大，对象松散，被处罚对象根本不敢索要发票，等等，所以易于贪污舞弊，每年约高达 2000 万元人民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搞发票，后来即便规定用发票，也凭个人品质，设有制约，这实际上成了薄的尽由个人支配的小金库。所以，尽管大连百姓无不痛恨彭某某，曾经多次暗杀它，并上告中央，但无耐薄熙来青睐他，只要一出乱子，造成群众围攻，他就坚定地站在彭某某一边。连站前派出所的民警都看不惯他，说他办一切事，只听薄熙来一个人的，群众骂他是薄喂养的一条咬人的疯狗！

1999 年，由于他肆无忌惮，恶性膨胀，他的部下胡作非为，终于闯了大祸。有一个湖南人，跑到大连打工，在电柱上贴小广告，内容是办假证，这即影响市容，也易于骗人上当，大连综合治理办的几个人抓个正着，原本这点小事，最多不过拘留几天，但彭某某手下的这些人，如果一天不打人玩，心里就烦，刚好把这个人抓来，就无视法律规定，把人关押在大连天主教堂，他们一边喝酒，狂呼乱叫，一边刑讯逼供，大打出手，一个外号叫九子的人，打人最凶，在大连坏名声仅次于彭某某，他把那个中年人整整打了一夜，终于使他在凌晨惨死。

第二天，事情捂不住了。死者家人带上湖南电视台记者，匆匆赶到大连又哭又闹，要求为先生申冤，惩处凶手。中央电台驻大连记者李某某也气愤地赶到现场，扬言要为死者讨回公道。面对压力，彭某某又与以前一样，去求薄熙来，但不巧，他在国外访问，公安局便把九子等人抓起来，彭某某声称不怕，因为手中有薄熙来的把柄，不怕他不给弟兄们做主。

果然薄熙来一回大连，这几个杀人犯，不仅在姚家看守所享受特殊待遇，而且刑案交由西岗区法院审理，薄下令重罪轻判，1999 年西岗区法院院长周某某对我尽显难言之隐，这个情节极其严重的故意杀人案，按照法律规定，应当一审由市中法接手，但却推给区级法院，可见薄恣私枉法达到如何严重程度。后来这几个杀人犯，在监狱关个一年半载，全部回家了。为了堵住死者家人的嘴，赔了 100 万了事。反正薄熙来，彭某某等有的是钱，羊毛出在羊身上，大不了再多抓点人，再狠罚点款，如此而已。

操控新闻媒体，一手硬一手软

为掩盖大连每天发生的恶行，薄全力软硬两手交替使用，操控大连媒体，拉一批打一批，以使他们变成八哥嘴，只能唱赞歌。他在友好广场修建了避邪的水晶玻璃球，又难看，又刺眼，即浪费公款又影响司机驾车，但大连日报记者马某，用令人肉麻的辞句吹捧此举，却压服不同看法，不让见报。薄为了感谢她，下令报社在博士公寓奖励一套住房给她。另一个姓姜的记者常年追随他，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他也在中山区协助解决住房一套，另一个记者惯于吹捧他，他不仅安排他在市委办公厅任职，后来还把此人调到省里身边工作，也成了他的吹鼓手。锦州有个落魄文人写信给他自荐，薄见他文才不错，调到身边重用，并依据薄的旨意，进京巴结江泽民身边之人，呈上草拟的有关大连百年的诗句，请江题写，

尔后此人到处宣称，薄叫他当文字秘书，连江泽民的诗句亦出之他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此等 犬儒文人，竟被薄安排到《东北之窗》杂志任要职。

相反地，大连日报有个记者不吹他，他想抓他又无把柄，就把其调离报社，1998年后由于我在香港《前哨》发表文章提到大连日报内部消息，他怀疑是内部有人提供信息，立即恼羞成怒，命令大连政法委书记成城，下派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进驻报社，以廉政建设办名，抓捕了广告部经理相某某，业务员刘玉生 等，后来二人均被判刑，另有数名记者被专案组带离调查后释放。此后其对大连新闻界的整肃逐步升级，又将大连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扬庆典以渎职罪拘捕判刑，接着在 2000 年 12 月 4 日将我拘捕下狱 5 年多。此外，薄还把大连日报副总编周大新调离报社，并从卑劣的手法羞辱原大连日报资深编辑杨再青，使其郁郁不得志。90 年代初邓小平南巡之后，薄熙来任市长后亲自带队第一次赴香港招商，大连日报委派老记者杨再青随团采访报道，杨时年已近华甲，第一次去香港精神很振奋，见到香港的地道粤菜亦十分喜欢，午宴吃饭时难免舌头在嘴里发出不雅的声响，他人一笑置之，薄熙来却愤然离席，责令招商团秘书去赶走老杨，并说以后饭桌上不想再见到他，秘书颇为难办，他认为杨的生活细节固然不雅，但此等小事，怎能拒记者入席，思前想后，便谎称编写简报需午间进行，非杨记者他人不能办，才免于薄与其再见。后杨返回报社，此事传开，杨受辱难忍，提前病退。大连日报知情者透露，杨当年在报社曾拒发薄熙来拍摄的有关金石滩的风景照，其怀恨在心，但杨 却不曾记得，十多年后薄才故意找碴整他，以解心头之恨。

原大连日报文艺部记者，散文家王素英，原本是大连文坛公认的才女，但只因不顺从薄熙来的旨意，拒写拍马屁的文章而备受冷落，还受到薄安插在报社内部的亲信的排挤，得不到重用。后来只好半退休从事文学创业，薄离开大连后才当选为大连作协主席。她在 2007 年与我饮茶叙旧时说，她赞同我在香港杂志发表的有关苏军烈士纪念塔动迁风波的观点，并后来也在大连当地媒体发表一篇类似文章，令我欣喜。虽然这时薄已离开大连，但其党羽遍布，媒体依然禁若寒蝉，故其良心勇气可嘉。

做表面文章，大修草坪与广场

平心而论，薄熙来主政大连之前，大连就有修草坪的事情发生，魏富海任市长时，就在市政府门前的大连斯大林广场，平整土地修了草坪，当时亦有争议。但这无可厚非，因为并不过份。但 1993 年开始薄搞的这一套，明显超出了大连财政的承受能力与地方实际情况，大连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三面被海所围困，只有一面与辽东半岛相连，自来水唯一来自碧流河水库，而近年的水资源趋干枯竭，试想，连人吃水都难，何来草吃之水？

因此薄熙来大抓狠种的这些草，不仅当时浪费了大量的金钱与水资源，而且给后人留下了沉重的负担与难题：毁掉这些进口的草地吧，薄当年大都是搞的进口的草籽，价格不菲，太可惜，保留吧，又养不起，不用说水，光照顾草的人工费难以承受。所以，大连市民都骂薄来是败家子。他离任时耗尽大连财政所有的钱，还不算出卖的地皮。

为了急功见利地让上级看到成绩，也为了通过引进草种给亲友带来生意，薄在大连大举投资，搞绿地，广场，城雕，公园，到处刻碑记功，到处题字留念，企图在掠夺金钱的同时，还将假请廉的名声传之千古，所谓星海广场就是典型代表，他不仅修建这个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而且修建了象征封建帝王权力的华表，薄还恬不知耻地把个人的脚印，经铜铸后刻在广场海边，同时还假借大连百年之名，在大连劳动公园建在百年仓，把江泽民的题辞与他给未来 100 年的市长的信物，挖地三尺，埋在仓下，以便后代品评。薄利令智昏，忘了一点最重要的东西：100 年后中国毕竟是民主宪政国家，他这样的搞文字狱的人，必将象秦桧一样下场，我断定他这堆报烂货不用等 100 年，就会被人毁灭！

在大连棒棰岛宾馆两侧，是草坪最漂亮的所在，如果只看这里，是人间天堂，但再去看庄河北部山区的村路与学校，是贫困不毛之地，二者反差天壤之别，为什么？因为中央省市领导到大连，首先要走这条路，要以车带步两侧看，薄就这样把他们眼睛拴住了，进而玩他们于股掌之上。但他绝对不会真心实意地帮助北部山区的穷人家，外来领导吃了棒棰岛的海参，也不会知道大连北山市的存在。

薄在任的 8 年，靠炒卖土地攒钱，搞了钱就修广场，铺草坪，广场越来越多，楼房越来越高，草坪越来越大，但普通百姓越来越穷，虽然广州等设有这些表面文章，但一般市民有钱。大连是只有薄熙来照顾的一群权贵精英阶层发了大财。普通老百姓包括机关的小职员都设有钱，则是不争的事实。

2000 年上半年，薄还提出要在大连港锚地建一个与美国纽约自由女神象一般大小的渤海明珠城雕，其目的是想让他傍的大款，再狠攒一笔设计费，此前他提议建的会展中心大楼等众多大项目，无一不在美国设计，这些公司均与谷开来有关系，她与程某某搞的所谓惠瑞斯顾问投资有限公司就是盯着这些大肥肉的。幸亏，这个渤海明珠因为薄升到辽宁省长的高位，要集中精力与闻世震争夺权力而无暇顾及，否则又不知要挥霍百姓多少血汗钱。

许多烂尾楼与大的项目均与薄熙来有关

在大连中山区青泥洼桥，有一栋至今仍然烂尾未能全部完工的大楼叫金座大厦，从开工算起，足有 10 几年。它的兴建，始于 90 年代初期，薄熙来带着太太，还有一些官员去深圳招商，由大连一个摄影艺术家张某某介绍，认识了曾老板，其给薄太太买了大宗高档衣服，与其拉上了关系，回连后批得了这块钻石地皮，但曾某只想倒地皮，得到这个项目后又向银行贷款，又行转卖，得手的人再转手，几轮下来，成了久拖不成的烂尾楼盘，成了后人弄不清的无头案，到了 2008 年又拍卖流拍，至今只在一楼装修对外营业，其它风吹日晒，还在闲置。至于薄的亲友在其中有何猫腻，有谁知道？

另一楼盘 90 年代中期亦轰动一时，名叫宝珑新世纪大厦，外方是台湾人，中方是大化，当时这个地产开盘时仪式隆重，薄亲自剪彩，会议下发的画册中有一页印有开来信箱，可见薄家与开发商关系多么不同寻常。然而拿了项目贷了款，收了客户的购屋订金，这些开发商却逃去无踪，使这个地皮冷落了很久，后来才转手它人，建成酒店。从 97 年起我就想扯开此案的黑幕，终于因为薄及其死党强

力阻挠而未果。我很想给这个开来信箱发一封信，问她与该老板为何走得如此之近。为什么不公布此案内情？

与上述齐名的还有大连友好广场的天源大厦，此地原为大连运输公司地皮，大连甘井子区海茂村的农村青年金某，不知通过什么途经，与谷开来拉上了关系，以优惠价批得了这个项目，他并不想真心开发，只想炒地皮，就抵押贷款后，转卖脱身，一下子发了大财，由昔日求我办事的卖轮胎的小个体户，成了移居新家坡的大老板。由于金某的兄长与我是好朋友，1987年前后与我过从甚密，所以有话不避我，他说这个项目开工典礼一定能请到大官，不是薄熙来也是他老婆，果然不错，谷开来亲自一身名媛打扮，出席剪彩，好不大方！大连晚报一个记者说，薄一家两口人，先生批地皮，老婆去助威，配合得很默契。这个项目的背后又有哪些交易，只看他们心知肚明。

由于大连遍地起高楼，可以说每个楼后都有阴影，每个影子里都藏有薄熙来及其死党腐败的故事。比如远大大厦前身叫帝王大厦，薄把这个地批给了徐某，是给李铁映的面子。日航酒店的前身是希尔顿，再往前追是由家住盘锦的郑某某具体开发的，但这个项目是薄批给亲信李某的，还有三屏花园是薄熙来批给陈云后人的房地产项目，新开路临东街的一地块皮，是薄批给金州的铁哥们范某某的，建成后想强行卖给大连日报被拒，没办法车克民主政的大连国安局买了几层楼办公，由此可见，薄与这些大款的密切关系。

还有更为蹊跷的是，大连市动物园早在1995年即大举动迁，当时在新闻发布会上，薄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在这个旧址上马上开工建设21世纪大连标志性建筑，但两年后即1997年5月24日已在北石道街，建成了新的森林动物园，但这个地方依然一片荒芜，人们问：薄把这个黄金地角批给菲律宾首富陈某某，为什么其在12年后即2007年4月27日才举行奠基仪式？这期间发生了什么状况？当时地价多钱，现在多钱？薄做为一个脾气很大，很急躁的人，为何对这个投资高达60个亿的世界级综合商业工程，如此有耐心？如此宽容？

此外还有徐才厚亲友在瓦房店长兴岛的房地产项目，王震后人在大连开发区的美食城项目，李鹏之子李小鹏在金州搞的华能电厂项目，等等，无一不曾得到薄的细致入微的关照。退一万步讲，即便他没有直接收取金钱，但他利用职务之便，批大项目送人情，这个感情投资如何计算？

欺骗朱容基，过河便拆桥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薄熙来与大连大光地产公司的老板林镇洪关系不错，林是一个为人圆滑的商人，不仅在澳门开了卷烟厂，广州兴建了写字楼，广西办了印刷厂，泰国设了餐馆，而且还在大连建起了星海花园与大连世贸中心，显然林老板知恩图报，与薄及其马崽走得较近，由于我在香港文汇报上报道过林的地产，所以他也常请我喝茶海聊，其中有些情又经另一在政府工作的朋友证实。

薄熙来对别人特别是下级爱反问一句：你别骗我啊？！形成这个习惯，是因为自己经常骗人。90年代中期，大连在星海湾兴建大连星海会展中心，全部由政府

投资，有些老干部给上面写信告刁状，认为不应当把钱用在这上，信到了朱谔基手里，他看了很生气。就派人到大连查，自己亦亲自去看。薄熙来听到了风声，很是紧张，谁都知道朱不是好惹的。但薄熟读《三国》，知道兵不厌诈的道理，就匆忙找来林先生，要他假冒港方，市政府为中方，一夜间把上述项目变为中外合资企业，连合同章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董事会决议，班子成员，都以假乱真，比真的还真，等到朱总理到了，实地一看，不能批评，只能赞同，并得出结论，那些马告状信的老伙，是吃饱了闲得难受。。。。。。等朱一走，一切复旧。

故此薄对林一度很好，批了星海湾两块地给他，盖了两栋楼，林捞了一大笔钱，为了谢他，林把大搂土建的话给金州一建，有意让薄的哥们发财。薄很高兴，有一次在酒席上说，我可能去天津工作，到那时一定把你带过去。当时官场风传，他异地改任天津市委书记。

但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林不知道为什么薄与其疏远，现在回忆，可能与林和我密切接触有关，薄通过国安特工，很容易由手机信号查到。所以金州一建的施工队与其交恶，以林不及时支付工程款为名，封堵了他的办公楼，起诉到法院亦找不到公道，林请我们写稿，我派同事去调查，还设发稿，林又反悔。。。。。。林希望薄还能念旧帮他，但薄惯于过河拆桥，不但不主持协调，还以土地政策变化为由，强行收回了原先批给他的一块地皮，它位于五一广场立交桥旁边，当时林已施工挖了地基，只因市场突变资金同转不灵，这样他损失惨重，他说我是打碎牙咽在肚子里。

2002年我关在大连看守所，在报上知道了五七空难，不料看到死者名单中有郑洪，他是林老板聘的大连经理，我与其多次打交道，故念及上叙往事，但愿林先生过得平安。他应当知道，自己曾利用薄的权力找项目攒钱，反之亦然，薄熙来这样的政客，连朱总理都骗，何况一个林老板，他对谁都不会有真情，也不会相信信任人。这是事实。

一个建筑公司吃掉了五个建

一建指的是大连金州一建，它目前是大连首屈一指的建设开发公司，不论经济实力，人才，还是知名度都堪称一流，但在80年代中后期，它不过是一个集体性质的金县乡镇企业，我曾在友好广场一个该公司临时租用的小酒店里，多次见过老板范某某。应当讲，范是一个外表粗鲁但内有城府的人，除了讲哥们义气，会管理，会用人之外，全靠薄熙来帮忙，伴随此人权力的上升，企业由乡到城，由小变大，由单一土建变成综合性企业集团公司，最后吃掉了大连与之唱对台戏的五个国营建筑公司。

以前，在魏富海当权时，基本上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副，或者说转型刚开始，大连五个建筑公司分享了土建市场，个个过得不错，不仅职工人人发工资，而且个个有福利保障，拿一建来讲，不仅在大连中山路上有阔气的五层3000平米办公大楼，还有著名的一建俱乐部，我多次见过候立政经理，他告诉我，大连很多大的楼房都是它们建的，但自从薄熙来上来后，权力与市场连在一块了，薄

下令把原本属于国营企业做生意，全部给了金州一建或阿尔滨，它是另一个金州乡镇企业。我问有没有自身的原因？他说有，国营机制也有问题，比如人浮于事，政策死板等，但五个建筑公司原本人才济济，经验丰富，设备先进，但都面薄的操纵下，一个个垮掉了。大连一直有流言说，薄的亲友有股份在其中，去碍于新闻封锁，不能查证。另一家国企老板对我说，薄真不可理喻，做为共产党的干部，不帮助 国营企业，却帮助集体乡镇企业，是何道理？

2000 年底之前，金州一建已改名为大连金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但主要业务仍以建筑为长，但 2006 年我获释后发现，它像母鸡一样下了一大窝蛋，下面派生出数家分公司，大都得到土地大搞房地产开发，几乎个个都随着地价升值而发财。其中单是王某某一人主持的地产公司，就每年赢利数千万元。另一骨干企业 二公司，已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承包特级资质，并于 2002 年在大连建筑企业中率先通过三级企业认证体系。2005 年底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 28.6 亿元。当然，我指出的是早期薄对它的支持，近些年它羽毛丰满后，与历届政府关系都十分密切。

在大连企业界，如今范某某已成了龙头老大，不仅财大气粗，而且是人大代表，当年我第一次见他时，他只不过是一个包工头子，但经二十几年闯江湖，在薄 熙来的精心扶植下，发展到现在每年光利润就能攒几个亿，他手下的弟兄们，大都全世界各国往来，子女留学定居欧美已是小事。看一看其在大连西岗区新开路 89 号的集团总部办公楼—金广大厦，想一下那些在不公平竞争中倒闭的国企及其下岗病困的职工，听一听大连电视台不厌其烦地播放的金州一建的广告辞：安得广厦千万间，金州一建，心中戚戚然，我斗胆改了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一个建吃了 5 个建，薄熙来敢干！

巴结港商黄鸿年，企业全卖光

90 年代初，大连轻工局属下共有 100 多家企业，有的效益不错，有的产品滞销，但不论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其厂房或办公楼都位于大连繁华地角，也就是说它的地皮很值钱。谁也不是圣贤，当时的官员急于对外招商，寻求合作，吸引外资，做出许多荒唐事，也不必大惊小怪。问题是，薄熙来与港商黄鸿年的合作，一没有民意基础，二没有科学论证，三没有请示上级，结果刚坐上这个市长的空座，就闹出了天大的笑话。

黄鸿年是香港中策集团的老板，也是印尼第二大财团金光集团董事长黄奕聪的儿子，曾在北京第 26 中学读书，文革中当过红卫兵，所以非常了解中国，他发迹后首先抓住邓小平南巡之后带来的商机，进军中国，巧妙地与官员拉关系，先在山西靠上省委书记王茂林，经其介绍，搞了一家合资企业，接着去杭州，又攻下市长 王永明，在其支持下，收购两家中企，尔后转去福建泉州，搞了 41 个合资企业，立即震动了中国商界，一时被吹捧为中策现象，好大喜功的薄熙来根本不懂经济，不关心企业职工的命运，竟与到访的黄鸿年一拍即合，决定将轻工局下属的 101 企业，一揽子全部卖给了他，使数万职工下岗，此举在大连虽经媒体狂吹乱捧，但因直接涉及到群众的切身利益，而遭到强烈反应，数千人上书中央，告到了江泽民处。。。。。。因为十分明显，素有股市金手指之称的黄鸿年是个

精明的商人，他看中的并非企业的产品，工人与厂房，而仅仅是脚下的地皮，只要工人离去，地价升值，他盖起大楼，就会肥得流油。做为新加坡排在《福布斯》第29位的富豪，不在乎大连百姓疾苦情有可原，但薄熙来做为一市之长，竟拍板做出这种决策，真是匪夷所思。

据媒体报道，1992年4月到1993年6月，中策集团斥资4.52亿元人民币先后在上述地区打通当地官员的关系，廉价地购买了100家国企，又收购了3100家集体企业，也就是说，如果对方出得起钱，整个国家都能卖了。大连不幸在薄的手中险些一下子卖光了101块黄金地块，难怪一个老干部在1994年写信给我，骂薄是卖市贼，是与黄鸿年有私下交易，但由于初到港报工作，无暇查证。1992年至1993年薄是副市长，这件事的前半部可能其它人亦有失职责任，但薄在上述合同因上级否决而中止前的1993年6月，则是主要责任人，理应受到查究。

当这一揽子卖企合同已正式签约，中南海的高官们才听到了大连人愤怒的声音，主即愕然不已，中国一个小小的计划单列市的市长，竟敢把101家企业连同职工一块卖了，那么谁是厂房下面土地的主人？谁是人民的公仆？外商算什么？你薄熙来算老几？据大连企业家俱乐部董事长刘某介绍说，当中央领导责问薄熙来时，他呆若木鸡，无言以对，他只喝了一大茶杯热水，接着一头大汗淋漓。那时刘某是政府经委干部，正随其进京汇报。

薄以后的举动表明，他并没有吸取以上教训。后来中央决定干预中止了这一荒唐透顶的合同，避免了工人一时失业下岗的后果，但薄熙来不服，依然一块块地慢慢地最终还是卖光了这些企业，因为他心里根本没有工人，只有自己，富人与外商，只有与其合作，才能名利双收，只有卖地皮盖大楼，才能捞大钱，才能结交权贵，才能让别人看出城市巨变，才能往上爬。另外我有些奇怪，即然签了合同，中止就构成违约，能与美国花旗银行打官司的黄老板，为什么不敢与薄也对簿公堂？莫不是同为北京人，天生有交情与缘份吧？1993年我曾在一个酒会上见到黄，但他心情不佳，我也不想自讨没趣。我想他们的事，大概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假如这回失误，出在他人身上，不追究刑责，也免不了撒职。但薄不怕，老爹咳嗽一声，江泽民都要想一想，所以受了批评回到大连，拍他马屁精的人仍然夸他是大手笔虽败犹荣。

服装节加模特 劳民伤财

现在提起大连，人们自然会想到一年一度的服装节，并把它与薄熙来连在一起，其实早在1988年他当市长之前，大连已成功地搞过4届服装节，这与大连人天生喜欢穿戴讲究打扮不无关系。历史上大连人有话：苞米面肚子，料子裤子，形容的就是这种状况。一般的市民再穷也要千方百计穿上新衣服。所以服装节是大连人自己的节目，创办之初与薄根本无关。与星海商务区一样，别人先开发的，等他上了台，一切功劳均变成他的，包括服装节，也成了他的光荣业绩，当地媒体被其操控，全给他脸上贴金。

大连服装节在薄接手后，我印象中最深的是，他在开幕式上对着十几个外宾，用英文念讲稿，把魏市长气得脸色阴沉，因为会场上仅有的十几个外国人中又大都是日本人，魏市长亲耳听到薄一大在办公室背讲稿，英文是现找译员搞的，完全在做个效果。果然，会后大连市民说，你看老魏，嘴笨得象棉裤腰，你看副市长，大个英俊，还会外语。特别是一些于道老大妈，立马叫薄帅哥弄蒙了！此后这个浮躁的民意很快把薄捧起来了。当然，以后逐年进行下去的服装节，慢慢地扩大了规模，加大了宣传，提高了层次，促进了贸易，这都是事实，但这是发生在整个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的。即使它人在位也一样。而且每次节日之后被其隐盖的问题也不少，用劳民伤财形容，也不过份。我听到很多人建议，服装节当然好，但赞助受不了。薄熙来下令，设立了常年工作的筹委办，一年一届地连续办，年年服装企业都要搞赞助，实在是竭泽而渔，受不了。有很多服装企业老板反映，薄经常打电话，叫企业赞助服装节，搞路牌灯箱或画册，费用太多太杂，如不服从就派人调查经济问题，比如税啦回扣啦，等等。服从吧，又设有那么多利润。所以两头为难。笔者认为，三年一届即可。但薄不接受这个建议，因为他需要年年有成绩。

薄在市政府广场前设了女骑警，女交警，用此为服装城锦上添花，又在大连金石滩建了民营的服装模特学校，于某是著名的服装模特，任校长，她是薄每年拨款600万支持人，又一度占据了区政府办公楼，对外营业，管委会主任王传志为什么怕模特？我百思不得其解。大家议论纷纷，薄市长不在乎。每届服装节，干某带领的学员们，都能以模特表演吸引观众，并为薄的业绩添彩。

模特们除了服装表演还做什么？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或许从中可见秘密。1998年大连著名的服装个体户杨某某与其原老朋友，大连皮装厂长都某某反目为仇，两人为经济利益发生纠葛，都找我爆料，希望我以正视听，我与两人均有过交往，但知不能偏袒任何一方，只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真叙其事的新闻稿，后杨某某请我与一位律师喝茶，席间就请来两位服装模特做陪，经问这两人即来自模特学校，后来我吃过饭匆匆离去。再不曾参与杨与都的有关报道。2006我获释后知道，杨曾牵扯进慕马大案，慕的一辆汽车即存在他的车库里，后被没收，杨被关押数月后放行，但已不在大连经商。然而，模特学校依然生意兴旺。

大连从1988年8月20日起已举办了十几届服装节，从薄开始，增加了邀请官员与各国政要参加开幕式的力度，用公款让高干来吃喝玩乐，有利于自己升官，用声色犬马吸引外商，是为了向海外宣传大连吸引投资，所以整体上看，它重形式，轻内容，重表演，轻生产，重交际，轻贸易，据统计，第一届服装节时，大连服装企业700余户，2004年已发展到2590户，销售收入从当年的10几个亿增加到135.4个亿，但是平均到2590户企业，只有520万元，这与其它城市同业相比少得可怜。另据统计，七五与八五期间，在全国服装百强企业中，大连有8个企业入围，到了薄离开大连的2000年，整个辽宁以至东北只有大杨一个企业榜上有名。这就是说，薄所监控的媒体，用数字在自己与自己比，自吹自擂，但放在全国服装这个大盘子里，大连服装业根本排不上名次。亚洲最大的服装企业卓达集团，落户大连，但它是河北有名的品牌，所以在每年服装博览会的展台边，我都听到港商的牢骚，他们说订单拿的并不多，报上刊登的数字假大空，来宾的不同声音得不到回应。同时，服装节上本地的品牌始终不如外地或海外的品牌叫得响。薄熙来的心思，不会用在发展生产上，而是忽悠大连市长这张名片

而已。人们说，深圳不搞所谓服装节，但遍地服装店，到处是服装厂与身着名牌的丽人行，深圳的服装节永不闭幕。大连搞了多年服装节，只有一个名牌叫大扬，是农民搞的，在国际上也没有人认，只有薄熙来叫响了。

我认为，是在薄离开大连之后，夏德年调整了以上误区，他在第12届服装节开幕式上重新提个三个定位：服装企业交易中心，服装设计时尚信息交流发布中心，时装品牌孵化中心，这才是对的，但此后我入狱了，不知道做得如何。

薄熙来说 请文汇报多美言几句

只重视吹，不重视做，讲得好听，办事很坏，这是我对薄10几年观察得出的结论。90年后期，我与大连果品公司的丛者瑶经理熟悉，他女儿丛某曾在本办短期工作过，所以，当他主持的企业与香港的郭鹤年合资搞大连可口可乐分司时，规模不大的宴席上，我们办事处得到三张请贴，而且我有幸坐在郭公子郭孔丞身边，薄熙来陪郭鹤年在第一桌，我与另两个女同事在二桌，她们年青好动，主动去给薄与郭敬酒，我听到薄问这两个女记者是哪的，接着说：请文汇报给我们大连多美言几句。我觉得他做为一个市长，这个话不应当在这个场合讲。但他可以在文汇报领导在场的时候讲，不论在香港，还是在大连，他都有这个机会，现在他讲了，正显示出他致命的弱点。

实际上，在我主持的工作中，我们文汇报讲的表扬他的话太多了，把他恰恰给害了，他自己都不知不觉慢慢地利令智昏，变成了一个封建暴君。

早在1994年我加盟文汇不久，文汇报转发了新华社驻大连记者李某某一篇文章关于薄熙来的文章，洋洋近万言，还有许多照片，充满溢美之辞，我记得副总编刘永碧把这张报纸交给他看，他当时笑得眉飞色舞，但很快又收起了笑容，他发现了一张照片令他不满意，照片是脸部特写，眼角出了细密的鱼尾纹。。。。。。他对刘问：我这么老吗？。。。。。。

88年初魏富海当市长时，他当宣传部长，瞧不起老魏，89年3月他补进副市长，又开始排挤常务副市长宫明程，与其它常委唐启舜，李舒安，李光云，傅万忠，傅毓殿，等设有一个处得融洽的。95年更反感曹伯纯对他的监督，与谁塔挡都处不好关系，更何况对媒体记者呢？我记得我在大连日报读过一篇文章，说的是有个台湾记者到大连参加一个活动，发表了一点批评意见，他很不高兴，竟下令逼那个报把他辞退。。。。。。可笑的是，这种骄横的举动不以为耻，还通过他的吹鼓手，写在报纸上。

然而即使吹捧他，在有的情况下，也莫名其妙地会令他不快。有一次在大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举为一次记者招待会，他的老同学张某某向他提问，我现在记不住原话，任内容肯定是表扬他的，他满脸不高兴，很傲慢地居高临下地戏弄人家，他忘之，这个记者不仅是他在社科院新闻所的同学，而且是人民日报驻大连记者，这个举动，令在场人士惊愕。尔后又一次类似会议，我问张某某去不去参加，他这般蔑视地回答：去看他，不如去动物园看猴子！可见对他的印象不佳。

还有一次在棒捶岛宾馆9号楼，举办服装节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向他提出了有关北方香港的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很刁钻，而我并无恶意，他竟十分生气，一脸阴云。实际上在一个信息公开的多元社会里，记者的提问总是稀奇古怪，包罗万象的。一个领导人应当以宽广的胸怀包容不同的声音。

假如不是记者，是他的部下，一旦流露出对其不恭，他难免大怒。有一次在市政府开会，有一个叫王志峰的处级干部，设有做笔记，他忽然让他复叙内容，他的回答不能叫他满意，他立即大怒，把他赶出100多人的会场，令他在走廊罚站。这人当时是大连长海县长，与新华社记者李某某颇有交情。尔后薄又以此为由把他调离工作，现在这个人任辽宁省外办主任。类似的故事不能从我脑海里消失，是因为它太荒唐而不近人情。

还有一次，大约是1998年吧，大连搞一次中加理事会，在加拿大一批高官到访之前，市政厅要播放一个有关大连的风光片，我与大连本地另外两个记者先期到达那里，薄与一个放映员在现场忙碌，他对那个人说：你先试一下效果，不料放出来，画面搞拧了，这其实不过是一笑而过的事，何况观看的外宾还没来，然而薄熙来暴跳如雷，象一个发怒的困狮，大骂那个人，令我们瞪目结舌。。。。。

还是拿文汇报论事吧，记得还有一次，正当大连热议旅顺该不该对外开放的问题时，我撰写了一篇新闻稿，拟在本报发表，我的同事接听过宣传部的电话，新闻处长强调过有关旅顺军港的消息要慎重，故我们决定先发给薄本人看看，不过还不错，他日理万机，很快做了批示，秘书说批了，意见已退给宣传部，问宣传部，回应不知道。这让我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其实这事很简单：同意与不同意。不论怎样我还是发了稿件，我是在美言大连，但心中也不顺。

我想，薄熙来之所以如此骄横，主要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的，从小在北京享受特供特权，虽短期受难囚禁，但大部分时间是在一片赞扬声中生存的，现在又一下子把大连5县5区共590万人口交给他管理，他大权在手，又有父亲薄一波在中南海坐阵，就是这样绝对的权利，导致了绝对的腐败与专横。而让媒体对其只唱赞歌，只能美言，则是他当时对我们还很客气的说法。

你给我滚出大连 别再回来

薄熙来年轻气盛，仿佛有无穷无尽的使不完的精力，不仅是对媒体，对其它事情也是这样，哪怕是对一些具体的比如某一栋楼的装修之类的小事，亦亲自把关，只要他不满意，立即无情的斥责。大连星海会展中心最初装修时，就经历了一切变动，临近某个节日前要完工，还有三天期限，有关方面请薄视察验收，他看了后忽然大怒，当着聚光灯照射下的数十个相关人员，他指着那个承揽装修的韩国老板说，你干得什么活，你这个混蛋，赶快给我滚出大连，别再回来！一声令下，已豪华装修完毕的大厅，全部扒掉重干，一下子损失人民币数百万元。那个外商灰溜溜地消失了。

有人说，他并非不满意这个装修工程，而是他的哥们没有拿到这个攒钱的活，向他告状，他发完火后，这个生意就转手了。他的关系网上的人又发了财。

薄熙来的坏脾气，翻脸不认人的德性，在大连领教的人实在不少。大连中医院按摩师田某某曾栽在他身上。

90年代后期，薄熙来的颈推有病灶，急需治疗，大连中医院的院长谢某委派全院技术大拿田某某，去三番五次地为其按摩，薄很少到医院，他有疑心病，怕人算计他，就下令田大夫随时听命，并派司机去接，一年下来，田某某去薄办不会少干五十次，每次都要等他好久，一分钱也不付，反正医院发薪水，田某任劳任怨。然而后来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午后2点多钟，在薄的办公室里，田大夫为其胫椎按摩，由于薄市长个头高大，整天伏案工作，胫椎病情十分严重，有时供血不足，造成头晕，还易于发怒，所以田大夫有如履薄冰之感。正巧，一边按摩，一边有秘书送文件，薄止不住头部扭动，田的手指不小心触痛了他，主即，薄猛然跳起身，脸涨得通红，大喊大叫：谁派你来的？谁叫你故意害我？是不是于学祥！。。。。。。吓得田大夫落荒而逃。接着又派人到医院调查，幸亏田某是个老实人，一辈子靠祖传的按摩手法高超吃饭，虽然亦给于书记看过病，但给个胆也不敢暗害薄大人，实在是误会。不过薄还是不依不饶，下令让他提前辞职。田大夫对同事说，有时如约前去，他却不守信，叫我等，他当市长忙，我相信，也理解，但经常一等三四个钟头，就不象话了。薄熙来就是这样一个人臭无赖！

请吃饭 一家做一个菜

薄在1993年大连第十一届人代会上当了市长，终于把魏富海挤走了，他调到荣毅仁的中信集团当管后勤的副总，秘书李双全怕他整，去香港经商。薄的死党四处讲风凉话：魏四蛋只配在中信管食堂！秘书不出国，哪里能安排？

这时的薄熙来，心情特别好，下了好大的决心，要请市政府所有的副市长吃饭，消息传出，大家很高兴，薄的秘书通知，每个人可以带上太太，但去的七八个人，当然还要带上礼品，本来以为应邀到市长家中坐客，一定享受最高的礼遇，不料去了才知道，什么菜也没做，桌子上空空如也，只是司机去买回一堆东西，谷开来对著大家傻笑，薄熙来说，你们一对夫妇一家做一个菜吧！比比谁好。大家又生气又失望，但心里明白，他们家根本不做饭，谷开来不可能屈尊伺候这些副手，若叫车秘书做吧，又怕有人背后乱讲，所以才弄巧成拙。其中一位副市长对我说，薄就能搞一套！要清客就实实在在地请，大家都很忙，搞这个花样有什么用！。。。。。。别看薄眉飞色舞，但心里不放心，他对食品安全最重视。后来在场的人回忆，薄没吃几口菜，他在想心思。实际上，他想通过这种方式，笼络人心，搞帮派，给大家统一思想。

一般情况下，薄及其家人只在大连宾馆吃饭，不相其它地方的食品安全卫生，因为该宾馆隶属市政府交际处管理，不仅有全市一流的厨师掌灶，而且安全局在此有点，能够监控所有进出的人，薄亲自下厨检查过，对饭菜清淡的口味赞不绝口。

即然如此，招待大伙，为何不在这开席？薄那么做岂不让部下抓住把柄？公私分明，廉洁奉公，这是他伪善的一面，岂能不装？

其实这些副手，包括最没本事的负责农村工作的贾某某，个个都有公款吃喝的根据地，有的在富丽华二部，有的国际博览 22 楼，有的在新华酒店，有的在丽景大酒店，但他们除了工作需要，谁也不去大连宾馆，彼此心知肚明，那是老大玩的地方，今天到薄这来还不是为了表个态：俺听你的！或者说，咱们各吃各个，谁也别挡着谁！

薄不喝酒，怕酒后失言，但这回开了一杯红酒，侃侃而谈，讲了半天，大家才明白，上面对大连不放心，从株州市派来了曹伯纯当书记，薄不喜欢这个精明的小个子，提醒大家别与其走得太近，近了非倒霉不可。当然大家心领神会。

中央有江办 大连有薄办

薄走进了市政府，那幅踌躇满志的样子，仿佛当上了主持中南海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央江泽民有江办，薄熙来搞了个薄办，大连市政府接近他的人说，薄办有秘书吴文康与车克民，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司机王胜利，打字员某某等五六个人，最受争议的是漂亮的打字员，20 岁左右，肤色特白，细如凝脂，美丽温情，她整天呆在薄设在市政府三楼的办公室，好象文件总也打不完。薄不在乎别人的非议。动不动声色俱厉地指责部下，所以薄办是机关干部见了便躲，避之未恐不及的地方。

由于中共官员按排车号，一般从一把手开始，比如大连市委书记是辽 B00001，薄是市长，应是 02，卡国胜是人大主任，是 03，等等，这符合常规，薄很生气，认为自己设拔尖，就对分配车号的公安局领导说，我不要了，我要辽 B00051，即吾第一，结果全国只有大连市政府官员的车号特殊，都依职务大小，顺薄而下。

为了显示王者气派，薄到何处视察都要象江泽民一般清场，前有一辆专用进口基普车开道，尾有一辆武警人员驾驶的奥迪殿后，前呼后拥，捧者如云。其便衣保镖有几个，难以讲清。

有一次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到访大连，外交部新闻司允我近距离对其拍照，他的保镖不少，派头挺大，薄虽是一个小市长，其保卫随从人员也毫不逊色。我还亲耳听到薄对桥本吹牛，他站在滨海路一个景点上，手指一片海滩说，我天天在这游泳。。。。。。其实，在大连领导干部中，只有魏富海有良好水性，天天都游泳，薄熙来也喜欢游，一般在大连棒捶岛宾馆。我想他面对日本首相，忘了自己的身分，才自吹自擂，公然说谎。

在薄的心中，有高远的志向与膨胀的野心，所以才在亚洲最大的广场上，修了最大的华表，它在告知别人：他天下第一。

就是带着这种心态，他接受了一个风水大师的建议，不仅在市政府北面拓开了后门，还毁掉了大连唯一具有 47 年历史的文物——苏军烈士纪念碑，只是后来迫于压力，把它迁移到了旅顺，因为那个所谓算命大师指出，他近年屡遇挫折，升不上去，就是被市政府前持枪的大兵铜像，挡住了仕途。所以，他不惜操控人大政协导演了提案动迁的闹剧，耗资人民币 2000 万元，把苏军烈士纪念碑移走了。

为了当天下第一，薄熙来冒天下之大不韪，又画符，又烧香，毁掉了铜象基座，逆阻了天然风水，斗胆犯下了严重的破坏国家文物罪。

（薄熙来传 全文完（2010/09/15 发表）

《薄熙来传》后记

这是我在海外出版的第一本书，里面主要收录了我 2009 年 2 月 4 日移居加拿大之后撰写的 24 篇时评，一部报告文学，还有作为附录的 2000 年 12 月 4 日被捕前发表在香港《前哨》杂志的 3 篇文章，它们问世的时间相距竟长达 10 年，而此间我入狱 5 年零 1 个月，大概在目前的世界，只有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才能出现这种荒唐的怪事。这些文字有一个共同特点：用一个记者的眼睛，冷静地观察生活，批评了中共官员薄熙来，不论是他任大连市长，辽宁省长，还是商务部长，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我都对其持有否定的批评态度。

依据我自 1984 年至今长达 26 年的目击与思索，我得出结论：他是中共一党执政下出现的最具有欺骗性与破坏性的官员之一，如果他的职务再进一步上升，将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虽然，他在重庆摇身一变，唱红打黑，像一只正在开屏的孔雀，把最灿烂的假面具展示在世人面前，博得了不少人的喝彩，许多海内外媒体都被他所欺骗，但在我的眼睛里，他无法掩饰其反动本质和狼子野心。

现在，很多人，特别是挣扎于生活底层的民众，因为两极分化，社会不公，很容易被薄熙来美丽的谎言所骗，不论在党内外，还是国内外，他都有一批鼓吹者，竭力推动他进一步上升的势头，他似乎距离夺取中南海最高领导权，仅一步之遥。唯其如此，我才暂时推迟了我的狱中回忆录《欲加之罪》的修改与出版，其目的非常明确：用事实讲话，把真相告诉人民，让他们做出正确的抉择。

在中国，一个记者要批评一个共产党的高官，必须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甚至面临死亡的威胁，我竟不屈不挠地奋斗了 20 多年，并付出了坐牢的代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典型的悲剧。需要说明的是，我揭露他的动机并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依我当时的条件，我可以选择丰衣足食的道路，但我舍弃了一切物质待遇，仗义执言，身陷囹圄，义无反顾，原因非常简单：道之所在，虽千万人，我往矣！

我是一个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人，没有人具备我的独特条件：作为一个记者，我可以与薄熙来近距离接触；作为一个诗人，我对生活充满着激情；作为一个良心犯，我付出了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作为一个流亡者，我至今无怨无悔。我敢说，他近期在重庆的精彩表演，与我对他过去施政缺失，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罪行的不遗余力的揭露，不无关系，这正是舆论监督收到的最佳效果。显然，中共的封网在重庆尤为严密，但“翻墙”知情的网民很多，何况近年来到香港旅游的大陆客人越来越多，经常发表我文章的《前哨》，《开放》，《争鸣》等刊物大量传进了内地，我拥有一大批忠实的读者，故此，我虽然远在异国他乡，

并不寂寞。从大量的电邮，信件，口信得知，国内的读者认同，支持和喜欢我的文章。他们的鼓励是我继续写下去的力量源泉。

但是，毫无疑问，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的加拿大，给了我自由写作的最佳条件，在免于恐惧的条件下，天马行空般地辛勤笔耕，虽然收入微薄，却是一种精神上的巨大享受。人生苦短，笔意情长，我想把真相告诉世人，以便他们对专治体制上滋生的这个奇特的“薄熙来毒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旦成功地解析了他，也就深入了解了一党执政的中共。中国之所以至今依然游离在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之外，就是因为善良轻信的国民被首先剥夺了知情权。建立在无知基础上的行动只能是愚昧和盲从。建国以来，许多薄熙来似的中共官员忽悠了人民群众太久，中国绝对不能再这样持续下去了！这正是本人多年来立足用新闻自由，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使命所在！

我首先要感谢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它聘请我以特约评论员的身份，发表了许多文章，它从未对我的评论设置任何条条框框，本集中的大部分文章是其首发。而原香港《亚洲周刊》驻中国特派员王建民也给予我很多鼓励，他主编的香港《多维月刊》连载了我的长篇报告文学《薄熙来传》，影响深远，他自1998年与我相识以来，不论是我担任香港《文汇报》记者，还是不幸成为了入狱的囚徒，和获释后的失业者，以及流亡海外的独立批评人士，他都一如既往地给予我指教和帮助，令我感动，难以忘怀。类似的新闻界同仁还有：香港《前哨》杂志社长刘达文，《开放》杂志社长金钟，执行编辑蔡咏梅，《博讯》新闻网的老板韦石，《大纪元》新闻网的编辑们，《新世纪》新闻网的社长张伟国，《议报》新闻网的编辑杨宽兴，《北京之春》主编胡平，《纵览中国》新闻网的社长陈奎德，《观察》新闻网的编辑们，《独立中文笔会》新闻网的编辑野渡等许多笔友，因为收录于本集中的61篇文稿，如果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以及大力推介，是难以成功的，由于时间紧迫等其它条件所限，我没有一一注明每篇文章的准确出处，希望得到他们的谅解！在此，我对他们表示最真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此外，我还要感谢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法国记者无疆界组织，加拿大笔会及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他们的鼓励和错爱都是我完成这部书的精神动力！

最后，我还要说明的是，由于来历不明的网络黑客，对我电脑的不断设陷破坏，我不得不在草出文稿后立即发出，故许多文章错字很多，令我惭愧，这次收集出版时作了细致的修改，但依然难免挂一漏万，在此谨向广大读者致歉。或许还有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总之，我觉得每一天，都在与中国的专治统治者和网络黑客赛跑，智斗，较量，他们的暗中捣乱，使我更加勇敢和勤奋，并且坚信：这本著作不是轻松的文字堆积，是匕首，投枪，响箭，它带着我的血和泪，记录了铺满荆棘的岁月，孕育着美好的希望，我用心把每一个字点燃，但愿照亮中国新闻自由，民主转型的曲折道路！

2010年8月12日于多伦多。

（2010/11/21 发表）